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6年8月30日第75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张光渝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余汝信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

阎长贵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陈虹 父亲与母亲的千封家书（《我家的故事》选读）

欧阳欣 书讯三则

热点研究

陈闯创 文革开端的武斗与工作组问题

忆旧思亲

何蜀 他追求生命的厚度——怀念陈蔚德老师

编读往来

编辑部更正与说明

可父谈 73 期

小培谈 74 期

【书海泛舟】

煤炭部长张霖之因何而死？

——揭穿戚本禹的避罪谎言

张光渝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发表于《炎黄春秋》2016年第7期（停刊前最后一期），这是作者提供的未加删节的完整版。

我的父亲，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文革初期因遭江青、戚本禹先后点名诬陷和恶意煽动而被关押批斗致死，成为文革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江青、戚本禹被分别判处死刑缓期和十八年徒刑。他们两人的判决书中都有诬陷迫害张霖之致死的罪名。

文革发动五十年后，戚本禹在临死之前完成了《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并在他死后不久在香港出版。作为张霖之的后人，我当然很关心戚本禹对迫害张霖之致死一事有何交待。

果然，《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有《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专门一节。戚本禹虚晃一枪，说自己对张霖之被批斗致死“负有重大责任”，“感到很内疚”，却用很大篇幅将张霖之之死与“矿难接二连三地发生”连在一起。他在该节一开始就说“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在屡遭批评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在被毛主席点名为“走资派”后，“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戚本禹回忆录》下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520—521页。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

作为对照，戚本禹说，他在中办工作时看到矿难事件的“血泪控诉”，“都心酸落泪”，称矿难“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比张霖之更关心矿难事件和矿工的生命。张霖之“死官僚”（521页）的面目跃然纸上。

经过这一番铺垫后，戚本禹说，他的“责任”是在发动群众批斗张霖之的时候，忽略了张是一个“底下民愤很大”的人，“没有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因此被死难矿工的家属等人暴力批斗，忍受不住，“上吊自杀”。（520—521页）

我虽然对戚本禹的狡辩脱罪有心理准备，但读到这一堆公然的谎言，仍然十分气愤。戚本禹临死前，打着“内疚”的幌子抛出“责任论”，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逃脱罪责，二是继续诬陷张霖之。因为诬陷张霖之是逃脱罪责的捷径。

戚本禹的谎言包括如下内容：

谎言之一：煤炭部“一直不重视安全生产”。

戚本禹的狡猾在于，他利用煤炭工业矿难事件的真实存在，抹杀包括张霖之在内的煤炭战线干部职工为煤矿安全生产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要给读者留下张霖之罔顾矿工生命安全，煤炭战线事故“接二连三”并且一直没有改进的印象。

煤炭工业确实有矿难，张霖之作为煤炭部长，确实对所有矿难事件负有第一位领导责任。史上最大的一次矿难发生在“持续大跃进”、“跃进再跃进”的1960年5月9日，山西大同矿务局白洞煤矿瓦斯爆炸，时值交接班时间，造成680多名矿工遇难，震惊中央。毛泽东两次听取汇报，张霖之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参与指挥救援，军队也派出飞机运输抢险物资。这次事件中，压力最大、责任最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父亲。

当年的媒体没有报道这一事件。2003年，我以“俞虎”化名出版的我父亲的传记作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中，专门介绍了这次矿难。（《共和国部长的挽歌》215—216页）如果读者想了解更详细的史料，请查找何于清著《问苍茫大地》。

以白洞爆炸事件为转折点，煤炭部开始进一步清理大跃进时期盲目抓产量，忽视安全生产的错误倾向，痛定思痛，大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建设。在我父亲的领导下，煤炭战线推进“质量标准化”工作体系，以标准化保证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以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为此，我父亲提出了“安全是矿工最大的福利”的口号，下大力气改善煤矿生产面貌，扭转煤炭工业“傻大黑粗的”形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父亲曾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质量标准化工作，获得毛泽东的肯定，说：“看来质量是个命根子。”煤炭部一直坚持“质量第一”，“质量是命根子”的方针，扭转了大跃进时期盲目追求数量、贪多求快的倾向。直到文革前夕，我父亲身边工作人员夏方健提醒他，现在都在说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我们的这些提法有没有问题？张部长告诉他这个口号是毛主席肯定的。又说：一个口号对不对，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简单理解。夏方健后来说：近几十年来，“这个口号在煤炭战线已经深入人心，纳入了安全生产规范。”（原《中国煤炭报》总编夏方健书面回忆）

1990年《中国煤炭工业年鉴》记载：由于狠抓质量标准化为中心的安全生产工作，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百万吨煤炭死亡率比‘一五’时期下降19.8%，‘成为我国煤炭史上安全生产较好的一个时期。’

从局部看，根据山东淄博矿务局的历史统计资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淄川煤矿年百万吨死亡率达40到50人，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降到1.87人。

“大跃进”期间，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只顾高速度发展煤炭生产，忽视安全工作，安全监察机构被削弱。196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到7.1人。

1961~1963年，由于认真贯彻安全生产各项规定，落实局、矿、井三级领导安全责任制，恢复建立各种安全规章制度，推行“质量第一”的方针，开展质量标准化活动，安全生产状况显著好转。1964年百万吨死亡率下降为1.78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统配煤矿安全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安全监察机构被砸烂，安全规章被当作对工人的“管、卡、压”遭到批判，致使安全情况恶化。1970年百万吨死亡率上升为6.43人。（《淄博市情网站》www.zbsq.gov.cn）

无论从煤炭战线全局看还是局部看，1961年到1966年之间，煤矿安全生产形势都有了明显改观，成为我国煤炭生产历史上“较好的一个时期”。戚本禹所谓煤炭部对安全生产“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接二连三”的谎言不攻自

破。

张霖之部长严格推行质量标准化工作，煤炭战线老职工、老干部有口皆碑。篇幅所限，他们的文字或口头回顾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六零后煤矿企业领导干部对张部长的看法。

2004年，河南鹤煤集团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厂长经理日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该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劲峰时，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问鹤煤对质量是如何看待的？”

张劲峰：“我们煤炭采掘企业系统多、环节多、工序多、可变因素多，管理复杂，且时刻面临着水、火、煤尘、瓦斯等矿井灾害的威胁和影响，使我们对质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没有质量，我们连正常的安全生产都不能实现。正如原煤炭工业部老部长张霖之同志说的那样：‘质量是煤矿的命根子。’我们把质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人的质量保证作业质量，以作业质量保证工序质量，以工序质量保证工程质量，从而保证安全质量和产品质量。”（《乌龙飞舞》《厂长经理日报》

记者 李丙驹 2005年2月1日）

有关张霖之部长和“质量是命根子”的内容，是张劲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动提到的。这位大型国有煤矿负责人出生于1965年，也就是说，张霖之1967年1月被批斗身亡时，他还不到两岁。他这一代人仍然能知道原来有个煤炭工业部，煤炭部四十多年前有个部长叫张霖之，张霖之主张质量是煤炭安全生产的命



根子，令人非常感慨。（上图：1965年11月张霖之〔前排左2〕在徐州矿务局庞庄煤矿视察时与职工合影。此时文革导火索已经点燃。）

但是，与张霖之同时代，直接策划将张霖之打倒并迫害致死的戚本禹，却摇唇鼓舌，信口编造，颠倒黑白，把煤炭战线的安全生产成绩一笔抹杀。

戚本禹谎言之二：张霖之因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而被批斗致死。

众所周知，张霖之是被江青、戚本禹以莫须有的“彭真死党”的罪名迫害致死的，这是典型的政治诬陷、政治迫害事件。但戚本禹却打着“内疚”、“负有重大责任”的幌子，通过回忆录把张霖之之死写成其因为罔顾矿工生命、矿难频发

导致民愤而遭武斗身亡。这是一种既无耻又恶毒的狡辩，是戚本禹一贯的笔法和做派。

文革初始，我父亲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一样，都受到了造反冲击，正常工作以至于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这固然因文革运动大势所趋，但也必须有具体的个别人物的挑头煽动。1966年9月14日、9月18日、10月18日，煤炭工业部一个司局级干部萧声远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文革，诬告张霖之“与彭真的关系不正常”，“是彭真死党”；又说他亲耳听到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杨克 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

我父亲就死于这两项罪名，而他本人直到被毒打致死，也没有承认这两项罪名。

戚本禹不仅是最早看到萧声远告状信的人，而且是最早挑动萧声远造反、攻击张霖之的人。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嘱咐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女）：“萧声远是九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

（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收到萧声远告状信后，戚本禹拿出“抓要害”的本领，点拨煤炭部造反派：同彭真的关系是“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声远等人大受鼓舞，效忠表态：“我们要一鼓作气把张霖之的案定下来，以不辜负戚本禹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是从一开始就幕后指挥打倒张霖之的人，选打手于先，抓“要害”于后，亲力亲为。但是，戚本禹却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是“江青要我”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的，（《戚本禹回忆录》522页）而他对造反派的幕后指挥，却只字不提。

很显然，将张霖之迫害致死，戚本禹绝不是单纯的执行者，而是幕后指挥者。戚本禹公然撒谎。

从江青1966年12月14日公开点名之后，“彭真死党”就成了我父亲的代称。萧声远等人伙同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扣押、批斗、审问我父亲，逼供与彭真的“死党”罪证，妄图定成“铁案”。奇怪的是，无论是江青还是戚本禹，无论是在我父亲被冲击的时候还是被迫害身亡前后，谁也没有拿出“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任何证据！戚本禹洋洋数十万言的上下册回忆录，还用专节写张霖之被批斗致死，但是江青、戚本禹反复强调、公开号召造反派批判揭发的“彭真死党”罪名，究竟是何理由，有何证据，戚本禹却一字不提！

原因很明显：中央文革利用萧声远的诬告信，把“彭真死党”当成打倒张霖之的“要害”问题；萧声远借助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上位，投靠效忠，双方一

拍即合。而张霖之为何是“彭真死党”，戚本禹根本说不出理由，所以干脆不说。

1966年12月24日，戚本禹在矿业学院鼓动学生批斗张霖之：“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狠狠地斗！”有学生当场问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供群众批判用，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张霖之本人承认是“死党”。而这个“活材料”他们始终未能得到。这才是张霖之被毒打致死的真正原因。

戚本禹恬不知耻，称自己在矿院讲话中要求群众“要文斗”、“不要打人”，还说小报和记录上都“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522页）

“小报和记录”我不光看过，还保存着。上述戚本禹的煽动性讲话，就印在当年小报和讲话记录上，广为流传，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却一句也不敢提。任何有正常思维方式的人，读了戚本禹的回忆录，了解了当年讲话的主要内容，结论都会是：“戚本禹之心，路人皆知！”

戚本禹不光在回忆录中回避张霖之致死的真实背景，还虚构了一个假的背景，就是张霖之因官僚主义严重，矿难频发，“民愤很大”被批斗而亡。

我父亲被江青公开点名为“彭真死党”，遭北京矿业学院造反派拘押批斗。据戚本禹说，这之后中央文革开会，觉得批斗张霖之的火力还不够，群众仍然没有发动起来，“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于是江青要戚本禹去矿业学院“发动群众”。（522页）

在文革大背景下，一个所谓“民愤很大”的当权派，被江青公开点名，又被造反派关押审问批斗，却仍未激起“民愤”，还需要中央文革派出戚本禹去煽风点火，“民愤”何在？

为了给“民愤很大”圆谎，戚本禹继续用障眼法造谣：“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了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斗争起来是毫不留情，矿院的学生根本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522页）

戚本禹还假惺惺“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严重失职。”（523页）

这一套以守为攻的“自责”暗藏玄机，是文革笔杆子戚本禹的看家本领。

戚本禹首先模糊时间概念，把张霖之遭批斗“比较文明”的阶段放到“一月革命”之前，让读者认为是“一月革命”开始后各地矿工参与进来，才开始了武

斗。

戚本禹又公然撒谎，他用“自责”的口吻“检讨”没有派人去“控制武斗现场”，是“严重失职”。

实际上，我父亲受到所谓“比较文明”的对待，是他1966年12月19日主动到矿业学院接受学生批判，继而被扣押，到12月24日戚本禹矿院讲话之间的不到一周时间。他被关在矿业学院学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睡在双层床的下铺，四周都是看押他的学生。这期间他尚能与学生展开对话，也接受询问和批判。他虽然失去自由，但没有受到殴打。这就是所谓“文明对待”阶段。

转折点并不是“一月革命”，而是12月24日戚本禹的到来。显然，江青、戚本禹对以前的那个阶段很不满意，才要进一步煽动批斗张霖之。戚本禹发表了“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的讲话之后，当晚对张霖之的批斗就明显升级。12月25日，煤炭部的萧声远表示，戚本禹的讲话是“动员令”，“我们应该坚决响应”，“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

从12月26日开始，我父亲被先后拉到煤炭部机关、煤炭文工团、煤炭科学院等单位游斗，遭受毒打。以下是1966年12月28日煤炭部机关批斗我父亲的实况：

萧声远等人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彭真死党”，“张霖之同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拒不承认。这伙打手们立即扒下他的棉大衣拳打脚踢，倒剪双臂，强令下跪。”

（王元昌：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职工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4日）

“他们还拿了一根钉着大牌子的木棍插进衣领里，由于木棍上尽是刺，把张的耳朵和脸划破了，顺着脖子往下流血。”游斗一番之后“又回到院子里，脱下张的棉衣，架到一个小凳子上，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件单衬衫和一件毛背心，站在寒风中被打得遍体鳞伤。”（摘自煤炭部机关工作人员亲笔证词）

此时，还没有所谓“一月革命”。

中央文革在煤炭部派有联络员，与煤炭部造反派头目吴某保持直接联系。斗争张霖之的过程都被拍照留底，通过联络员上报分管煤炭部文革运动的戚本禹。这些照片成为戚本禹幕后操作迫害张霖之的罪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

戚本禹所谓“没有派人控制批斗现场”的虚伪“自责”，在上送照片面前原形毕露。

回顾当年对我父亲的大批判、大字报，所有焦点都集中于“彭真死党”、“污蔑毛主席是秦始皇”等莫须有的政治罪名。我父亲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多次讲话，被摘录在各种大字报和造反派小报上，但那不是为了肯定

他抓安全生产的努力，而是为了批判他“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比如，我父亲在1965年5月28日煤炭系统全国电话会议上讲话说：“质量是命根子，希望同志们像爱护生命一样地来爱护质量”；“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这点上请马克思保卫你，是不保卫你的。”造反派小报在这些话后面的批注是：“看，张霖之攻击毛泽东思想，真是无孔不入！”（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1967年1月28日第4版《反党分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父亲真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置矿工生命安全于不顾的“民愤很大”的“死官僚”，为什么江青、戚本禹不以此为罪名，号召群众批斗张霖之呢？为什么在张霖之被江青点名打倒后，中央文革还要不断幕后策划、煽风点火，唯恐其“民愤”不大呢？为什么要捏造连他们自己也拿不出证据的“彭真死党”的罪名呢？

戚本禹谎言之三：对张霖之之死感到“内疚”。

戚本禹在对张霖之之死假惺惺表示了“内疚”后，笔锋一转，紧接着写到文革中另一个老干部被群众在批斗中打死，“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原来此人“禽兽不如”，文革前先后强奸了女学生和她的母亲。所以这件打死人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戚本禹说：“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件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揭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的现状。”（《戚本禹回忆录》523—524页）

戚本禹不愧为“文革御笔”，这一段文字一箭双雕：把一个被称为“禽兽不如”的领导干部被愤怒的群众打死与张霖之之死并提，其题目《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等人”就是指这个没有姓名的被打死但“事出有因”的人。此人为何与张霖之放到一起写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死都是“民愤很大”！先不说戚本禹提到的这件事真假如何，但他在为张霖之之死“自责”后，立刻用暗喻的笔法将张霖之与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并列，所谓“事出有因”，其实是死有余辜！天下有如此的“内疚”吗？

戚本禹接着点出“要害”：当年没有彻底打倒包括张霖之在内的走资派，才造成了今天“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大复辟”！

戚本禹被迫捧者奉为“大帅”。果真，连其“自责”、“内疚”的笔法都无人能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对张霖之做了这样一个评价：他“后来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

喝喝，没有其他问题。”（523 页）

一个对受害者之死表示了“内疚”的人，如此轻佻地评价受害者，这样的所谓“内疚”没有半分诚意。

戚本禹人格之低下，不在于他死守文革阴魂，而在于他巧舌如簧信笔由缰的习惯性狡辩和诬陷。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把他在仅仅三四页纸中的谎言一一详尽驳斥，但读者可以据此衡量其全书的可信度。

比如，他为了塑造张霖之“吃吃喝喝”的形象，把萧声远向中央文革状告张霖之说“毛泽东是秦始皇”的背景，从开会前的几个人闲聊改为“酒后谩骂”。

（521 页）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煤炭部各个时期不同的掌权者都对此案做过调查，但除了萧声远一人坚持外，始终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旁证。（杨克：在煤炭工业部为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 年 11 月 28 日）

戚本禹还说，他看过张霖之的验尸报告，“身上有很多皮下伤，有青瘀血斑”，是“上吊自杀”。（《戚本禹回忆录》522 页）实际上，我父亲死于被戚本禹挑动起来的近一个月的残酷批斗。当时在夺权高潮的混乱中，不可能认真、及时地查明真相，追究凶手。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的验尸报告也没有张霖之是“自杀”的结论。

文革后参与审判江青的特别法庭法官王文正，口述审理张霖之被江青迫害致死一案时说：“法庭接着投影 1967 年 1 月张霖之批斗现场照片和张霖之尸体检验的照片。”“张霖之的尸体检验照片更是惨不忍睹。只见他背部的伤口竟达三十多处，头部有一处重伤，其创深至骨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王文正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156 页）

在当年电视转播中公诸于世的验尸照片，竟被戚本禹轻描淡写为“皮下伤”，转而污蔑张霖之“自杀”。

我父亲在被扣押后惨遭批斗时，曾在造反派监视下对冒险去探望他的女儿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绝不自杀！”这是他留给我们全家的最后遗言。

1979 年 1 月 24 日，党中央举行包括张霖之在内的八位逝世于文革初期的老同志的追悼大会。在我父亲的悼词中，有张霖之同志面对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以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的评价，在文革遇难者的悼词中是罕见一例。这是对戚本禹的张霖之“自杀”说的彻底否定。

我为给父亲写传记，四处搜集他的生前史料，与当年一位曾在鸡西矿务局工作过的河北大学教师王春来有一段网上联系。他在 2004 年 2 月 26 日给我寄来一封用毛笔写的信，信中说：

收到书和信后很激动，不怕你笑话，泪水总在眼眶中转。我并未见过霖之部长，但他直到今日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因为他是我的老部长，六三年分配到鸡西矿务局干校，几乎天天说起这位部长，和他同时说起的还有黑龙江煤管局长李奎生，和他有过接触。他和霖之部长都是矿工的知心人。霖之部长的许多事，鸡西矿务局职工可说是家喻户晓传奇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人间自有公平在。谁做了有益于百姓的事，人民总是铭刻心头的；但是谁玩弄了历史欺骗了人民，迟早要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没有例外。

光渝，你下手可能晚了些，致使许多宝贵的材料可能永远流失了。但没有关系，像我们这一代在矿务局工作过的人，霖之部长永活心中，和我们同归于了。能有几个领导人像霖之这样存活在职工们心中呢？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戚本禹回忆录》521页）。在我看来，这倒是戚本禹唯一一句赞扬我父亲的话。

戚本禹这位曾经的中办信访科长能看到大量一般人看不到的人民来信，并据此宣称张霖之“民愤很大”。但王春来先生这位之前与我素不相识，而且至今也没有见过面的煤炭战线老职工却与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看法相反。我相信，他信中所说的“玩弄历史欺骗人民”，“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人，就包括戚本禹在内。

【书海泛舟】

《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早在2004年，余汝信就在采访戚本禹之后取得其同意发表过一篇《与戚本禹面对面》，后来又有长期交往，同戚本禹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只是看到《戚本禹回忆录》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即使是老朋友也不能不作严肃批评，以免谬误流传积非成是，因此写了指谬文章多篇，这是其中一篇，另有几篇将在《记忆》发表。

一、《戚本禹回忆录》有关张霖之的说法

文革中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致死，是1980年代初“两案”审

判时戚本禹被指控的三项罪名之一。为此，《戚本禹回忆录》特地有一节“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颇长的文字，罗列了张的诸多“问题”，以图多多少少撇清自己的责任，归纳其要点有（黑体字为笔者按原意概括）：

张霖之任煤炭部长期间不重视安全生产，矿难经常发生。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

毛主席多次要张霖之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他千叮万嘱，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毛主席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张霖之回去后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引起毛主席震怒。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的信件也很多，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毛主席点名说张霖之是走资派。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文革中跟着刘少奇狠整群众。尽管毛主席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字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中有煤炭部党组成员揭发张霖之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我们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江青和周恩来要我去组织批斗张霖之。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

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

矿难工人、家属进京找张霖之算账，他被工人打得忍受不了，上吊自杀。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

张霖之死后周恩来的态度。总理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师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张霖之民愤很大。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是我严重的失职。¹

二、被渲染夸大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

戚本禹上述“回忆”，从“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至“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揭露”的都是煤炭部主管的煤矿安全生产出了大问题。戚还说，“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其实，这是戚为塑造张霖之的负面形象，别有用心地渲染、夸大制造出来的

¹ 以上内容均见《戚本禹回忆录》下，520-523页，笔者归纳为要点时文字略有精简。

张霖之的“问题”。

古今中外，凡采掘产业，不可能百分之百杜绝矿难。问题在于文革前的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远非戚本禹所声称的那么严重。文革期间，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层（包括戚本禹本人）关于煤炭部和张霖之的历次讲话，都没有批评过煤矿安全生产问题。煤炭部直属院校北京矿业学院最主要的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主办的小报《东方红》，从1967年1月至3月各期连载的《反党头子彭真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霖之的滔天罪行录》，共列举了张霖之七大“罪状”——“第一大罪状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第二大罪状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第三大罪状与彭真狼狈为奸，结成死党，大搞反革命独立王国”、“第四大罪状在煤炭工业中推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五大罪状张霖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第六大罪状扼杀伟大的‘四清’运动”、“第七大罪状政治上反动，生活上腐化”，没有一条涉及漠视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上图：当年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揭批张霖之的小报文章局部。）



三、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

戚本禹说，“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就是”，并非戚本禹的发明，戚是拾人牙慧。这句话源自于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该报记者高晓岩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原文称，“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毛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文接下来称：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¹。

笔者认为，“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这句话，是1998年的这篇文章才编造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证实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

文革期间，无论是中央、中央文革的什么人（包括戚本禹本人），有谁引用过毛泽东这句话吗？没有！

群众组织编印的所有毛的讲话集中有这句话吗？没有！

查遍所有中央文件，有这句话吗？更没有！

事实上，毛泽东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是点了国务院一位部长的名，但那不是煤炭部的张霖之，而是冶金部的王鹤寿。高文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或许是来源于原始材料提供者的误记——将张霖之与王鹤寿混为一谈了。依照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公布的当日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如是说：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重点是党。）

主席：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²

¹ 此说后来出现在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一文中，载于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²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和讲话·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在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121。

高晓岩文章称，“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这句话相对来说还有点靠谱。王鹤寿是被毛点名的，他早在1964年4月已被免去冶金部部长一职，下放到辽宁鞍山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霖之其实没有被毛点名，所以，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他仍被再次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同年7月，再任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文革初期1966年8月间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三次参加毛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戚称，“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部长的位子上。”不对，正是因为毛从未点过张霖之的名，他才能“稳稳地”继续坐在煤炭部部长的位子上，直到文革的狂潮1966年12月后才将他打翻。

（右图：参加毛接见红卫兵集会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后排左起：刘澜波、廖承志、张霖之。）



四、张霖之是否“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

戚本禹称，“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揭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所谓“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指的是煤炭部机械局局长萧声远。据知情人称，1966年9、10月间，萧三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揭发”张霖之的“反党罪行”，主要罪行之一，是张攻击毛泽东是秦始皇：“1966年7月下旬在二楼会议室，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时，我到的比较早，坐在靠南面的沙发上看《参考消息》，这时人还没有到齐，当时大约有六七个人都坐在这屋的沙发上，没有注意看到是哪些人，后来张霖之坐在会议桌东头的椅子上，在我还在看参考消息的时候，张霖之说：‘第一任真厉害，古时候的秦始皇，现在的毛主席’。在他开始说话时我抬头看到他情绪很激动的样子，当时我认为，这番话很惊奇，是从哪儿来的呢？”¹

萧声远这一揭发，没有能找到任何其他证人。

张霖之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政治上一生谨慎，不可能在文革刚拉开帷幕之际无缘无故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萧是移花接木，张霖之是在文革前几年，在一次部领导会上讲形势时引用过毛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有关“我

¹ 俞虎：《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香港：高文出版社，2003年3月版，页271。

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的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主席站起来讲话了——记录者）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诛”，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谁要说现时不好，杀全家。当然我也不赞成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不好，读书人恨了他几千年。其实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¹

张霖之在会议上引用毛的话，本意是拥戴毛而绝非如戚所言在酒后骂毛“专制独裁”。前文已经论证过，毛并没有点过张霖之的名，因此，戚说“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戚这样说，是无中生有的恶意猜度。

张霖之是为萧声远这样的宵小所累。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余秋里曾警告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称：“张霖之所以完蛋，是因为出了一个萧声远，不要让这样的人出来挂帅，要把大大小小的扒手抓出来。”²余秋里与戚本禹对萧声远一类人的不同态度，思想品格之高下立见。

五、关于“彭真死党”的罪名

戚本禹称，因为张霖之骂毛“专制独裁”，“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又称，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戚本禹本人1966年12月24日晚在北京矿业学院对群众讲话，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

据知情人称，张霖之“彭真死党”的罪名，同样源自于萧声远。萧的揭发信指控张霖之首要的“反党罪行”，就是“部领导盖子没有揭开”，“张霖之和前市委彭真可能有问题”，“与彭真一伙，狼狈为奸，结为死党。”³

“彭真死党”在文革初期是甚重的罪名。但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康生、

¹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载佚名编：《学习文选》（二），1967年11月武汉，页513。

² 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主办：《红色工交》第九期，1967年6月7日。

³ 俞虎：《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页270。

江青、戚本禹以至萧声远都没有列举出什么实质性的、能拿得出手的证据。中共建国前，张霖之与彭真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直到建国后 1961 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中央决定从国务院分出部分权力到中央书记处，彭真负责“联系煤炭部和森林工业部”¹，张才与彭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右图：张霖之〔右 2〕陪同彭真〔左 2〕下煤矿视察。）

彭真对煤炭部工作的指导，在官方近年编撰的《彭真年谱》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如 1961 年 2 月 14 日是：“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二三月份煤炭供应计划，周恩来参加会议。”2 月 17 日：“上午，约张霖之、安志文、宋养初、李立三等讨论煤炭生产问题。下午和晚上的会议，谷牧、吕正操、吕东参加，继续讨论。讲话指出：煤炭要生产、掘进双跃进，现最大



问题是第一线的人少。”2 月 19 日：“上午，召集安志文、张霖之、王鹤寿、徐子荣等研究钢煤生产、市场供应、财政金融情况和整风问题。在发言中说：一月份经济情况不好，主要原因是农副产品供应少，工业生产惊人下降。煤矿工人的口粮中央已经调拨，下一步要把政治思想工作跟上去。政治思想工作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抓群众中的具体思想问题。”2 月 21 日：“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煤炭企业推广抚顺市胜利矿持续跃进的先进经验。讲话指出：胜利矿是政治挂帅同业务具体措施相结合的典型。结合全国煤炭企业双跃进的 actual，讲话提出以下措施：（一）做好设备维修、后勤供应工作。（二）加强采掘第一线的力量。（三）提高工时利用率。（四）继续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五）建立责任制。掘、采各有责任，煤炭部要向中央汇报采和掘的进度。设备、维修、协作都要搞责任制。（六）工资要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奖励要以中央计划的生产指标为准。下午，主持全国煤炭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工业生产形势和煤炭生产的主要问题。（二）现在怎么办。（三）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²等等。

彭真对煤炭部的工作指导，自 1961 年 1 月开始，1963 年结束。从上述两个月的摘要材料可以看出，均为纯粹的工作关系，与任何阴谋反党活动沾不上边。如果与彭真有工作关系的都可划为“死党”，那“彭真死党”可就不可胜数了！

¹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 93。

² 《彭真年谱》第四卷，页 102-107。

六、关于戚本禹 1966 年 12 月 24 日在矿院的讲话

对于戚本禹自己 1966 年 12 月 24 日在北京矿业学院的讲话，戚在回忆录中称：“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戚本禹到矿院，是于 24 日下午 6 时左右与穆欣一块去的。7 时左右，戚、穆在大饭厅与全院师生见了面，戚发表了讲话。笔者目前看到的有戚讲话详细记录稿和简要报道两种。详细记录稿载联合编辑组 1967 年 3 月编辑的《首长讲话选编（1966 年 11 月至 12 月）》，其中有关煤炭部和张霖之部分称：

以煤炭部来说，煤炭部长期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对煤炭部是很不满意的。不知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家答：不知道）煤炭部做官当老爷，还不如改成煤炭科算了，这是对煤炭部的批判。（这是毛主席说的）特别是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煤炭部毛主席多次批评了。这几年煤炭战线上广大职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给我们国家做了很多的事情。而煤炭部领导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没干好事。煤炭部张霖文【之】是彭真的私党。炮轰煤炭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鼓掌，呼口号）但是，要打倒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鼓掌）这是第一个问题吧。

简要报道载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政治部宣传部主办《东方红》1966 年 12 月 26 日创刊号，内容与上述详细记录稿基本一致：

在谈到煤炭部的问题时，戚本禹同志说，“煤炭部长期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对煤炭部的工作是根本不满意的，还有很多批评。这个你们是不是知道？煤炭部是不是给你们传达过？（群众，没有！）有很多批评。主席曾经这样说过，煤炭部不行，改为煤炭科算了，部长都是做官当老爷嘛！由科长办事，就改成煤炭科嘛！”他又说，“这几年，煤炭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取得了很大成绩，增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煤炭部的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做好事情。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张霖之部长，是彭真的死党。（群

众：打倒张霖之！)那么，经过这个文化大革命，你们对准了他，狠狠地对准张霖之，狠狠地炮轰张霖之，炮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好得很！但是，要打倒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详细记录稿或简要报道，都可以看出：

1. 戚本禹讲话中通篇都没有“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的类似语言，相反，而是有“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狠狠地对准张霖之，狠狠地炮轰张霖之”此类煽动性语言。戚本禹在这一问题上说了假话；

(右图：登载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讲话简要报道的小报局部。)

2. 此类煽动性语言，是张霖之在戚讲话后不足一个月即在矿院被批斗致死的主要诱发因素，戚当然难辞其咎。戚至今还将张霖之致死的主因归结为

“民愤很大”并编造了张的诸多不是，仍然借康生之口说张是“彭真死党”，又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是与其“一直感到很内疚”的表白表里不一、不相吻合的，其实戚在有关张霖之的一节里，主要就是为自己辨白；

3. 毛泽东文革前对煤炭部的批评，至多也就是“煤炭部做官当老爷，改为煤炭科算了”，没有“张霖之就是”走资派的类似说法，如果有的话，戚早已在讲话中宣布了。这也有有力地证明，所谓“张霖之就是”，其实并不是当时的说法，而是30多年后才出现的编造。

如果屡屡把后起的、别人的编造当成自己的“回忆”，《戚本禹回忆录》全书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2016年7月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

阎长贵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是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仅坚决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也坚决肯定和维护江青。这是他的根本立场，没有任何一点反思。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们不去管它，因为他也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然而，他毕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直接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他无疑是了解不少文革的实际情况的——只要他不隐瞒，不忌讳，实话实说，那他的回忆录是会给人们提供别人所不知道的不少真实素材的，这正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不能说，这方面的内容一点没有，但和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差得太远了。

戚本禹这本回忆录中，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比如——

关于“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戚本禹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在为派工作组错误进行自我辩解时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453页）

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1966年7月29日大会上，刘少奇没有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确实说到这句话，但他们都指出这是别人说的，他们借来说明问题。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陶铸在1966年7月30日，有明确交代。这一天，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科学院讲话。陶铸说：“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搞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一个小姑娘、中学生讲的。这句话，很有启发。”（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3次印刷，第112页）

关于“大闹怀仁堂”的会议记录。

在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当晚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很大，让他们立即找主席汇报。戚本禹书中说，张、王、姚2月16日当晚会后就整理出会议记录，向江青和主席汇报（第577页）。

这不符合事实，这个会议记录是后来为开批斗陈毅、谭震林等人的生活会才让张、王、姚他们整理的，这个记录经周总理、陈伯达改过，这无论如何是2月16号当晚做不到的。（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三次印刷，第217——220页）

关于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

戚本禹说，（1967年）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当晚，在钓鱼台

16 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没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王力、关锋的错误。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二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随后，叫来了王力、关锋。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做了批评。随后，江青就叫戚本禹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已选好的钓鱼台 2 号楼。去前，戚本禹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把他们安排好后，戚又回到会议室，向领导做了汇报。总理对戚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看他们，关心一下。（663——664 页）

戚本禹在这里说的王力、关锋受审查的时间不对。按王力本人的说法，他们被审查的时间，不是 8 月 26 日杨成武从上海回来的当天晚上，而是 8 月 30 号下午（《王力反思录》1019 页）。

戚本禹书中更严重的问题是编造，略举两例——

关于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

戚本禹说：1967 年 4 月初，清华大学蒯大富向我提出他们要召开 30 万人大大会斗争王光美。我告诉他，这事我决定不了，你得请示总理。后来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决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他们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总理和我一个电话，汇报现场的情况，基本都是说，一切正常。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给王光美披上旗袍，挂上一串乒乓球项链，这些都是蒯大富底下人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的。蒯大富下面有个女孩子，来向总理要王光美出国时穿过的衣服、项链什么的，说要把她打扮起来，跟她出国时候一样。总理不赞成。戚本禹还说，江青支持总理意见，也不赞成。江青还特别跟我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

戚本禹这番说词充满编造和演绎。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的王广宇写过一篇《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其中所讲的和戚本禹讲的根本不同。王广宇说，1967 年 4 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按：王是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笔者），对清华大学策划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的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 11 号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 16 号楼办事组所在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一串木制的

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的服装吗？为什么不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本来面貌！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太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井冈山兵团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马上去，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一片寂静，学生都在熟睡，哪里去找小潘？我艰难地找到小潘，告诉她有紧急事跟她讲。她把我带到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她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用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她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说总部同意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问关锋，他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总理批准才能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会前，总理和部分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她到休息室找总理，提出在批斗王光美时让她穿出国时的服装和配饰，说这是群众地强烈要求，不算武斗。总理开始不同意这么做，小潘一再申述这是群众的要求，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到王光美家取她出国时穿的衣服和行头。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应该说明，王力、关锋向我传达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莫说他们，其他中央小组成员，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敢擅自提出这样的意见。我知道王力、关锋是被江青叫到她住的11楼，不一会他们回到办事组住地16号楼，急急忙忙找我谈的，显然他们所谈的是江青的意见。这一点，有很多事实可以佐证。我亲自看到，4月10号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在清华井冈山总部；还有在这一天，江青跟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今天清华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你们可以去看看嘛！我只好派车把江青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送去清华；我为了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我也跟着去了。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

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这就是清华批斗王光美的真实情况。戚本禹居然说江青对他说“不能让学生们乱来，否则，出了事情，没法向主席交代”，这完全是瞎编。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大会的新闻纪录片。江青没去现场，她当天晚上就在钓鱼台 17 号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参见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 2013 年第 3 次印刷，第 201—205 页）。

关于关锋和我的关系。

戚本禹书中说：关锋的学生阎长贵（我 1961 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第 671 页）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文革中，从 1967 年 1 月戚本禹把我推荐给江青当机要秘书，整整一年，1968 年 1 月江青就诬我为“坐探”，而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了七年半，接着又被流放到湖南一个农场 5 年，1979 年我作为受江青迫害的人获得平反，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2 年关锋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我和关锋都住在红旗杂志社宿舍里，一个院，我住 1 号楼，他住 3 号楼。当时组织告诉我要少和关锋联系，我服从组织决定。而自 1988 年后，即关锋出狱 6 年后一直到他 2005 年逝世，我和关锋关系很密切，他有什么事都找我，我也经常去看他，和他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明确告诉我，我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学生。我写关于文革的回忆录，本着“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古训，不论对谁，包括对江青，我都是这样。和戚本禹说得完全不同，有一次关锋跟我说：“江青关你七八年，你没说她什么坏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关锋这样对我说。

2016 年 6 月

【书海泛舟】

父亲与母亲的千封家书

（《我家的故事》选读）

陈 虹

《我家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8 月出版。这是其中一篇。作者的父亲陈白尘是著名作家、戏剧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人民文学》副主编，文革前夕文化部和全国文联“整风”时即遭批判，贬至江苏省文联，文

革中被揪回北京批斗，打成“文艺黑线人物”、“叛徒”，并交中央专案组审查。

总想为父母亲写点什么，尤其是当二老均已驾鹤西去，这一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相依相伴 55 个春秋，同舟共济大半个世纪。父亲在世时，他们是一对受人艳羡的贤伉俪；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在他的骨灰盒上写下了：“来世我们还做夫妻！”的确，父亲与母亲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父亲与母亲的感情也实在太深了，从哪里写起呢？——自然，首先应该是生离死别的考验。我不由得想起文革期间，他俩长达七年的两地相思，以及那上千封的来往书信。

大诗人杜甫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发出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叹，然而他又怎会理解，在一个将人变成鬼的年代里，家书的价值又岂能以“万金”来相衡！父亲与母亲间彼此传递的，绝非是一般的“手札”和“尺素”，它明明白白是一颗诚笃的忠贞不二的心！

父亲于 1966 年的 9 月 11 日被两名彪形大汉从南京家中押往北京去接受批斗。在父亲当年留下的《牛棚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S 将南京寄来的包裹当面拆开，检查无讹后方交还于我。返回宿舍立即从‘机密’处寻到玲的复信，读后心潮起伏，不能自己。立复数行，大呼：‘玲知我！玲知我！’这是批判会后所收到的第一封‘私信’。”尽管没有更多的背景介绍，但是又有谁能看不懂“批判会后”“玲知我”的力量？整整七年的时间，父亲一定是靠着它而顽强地活下来的，母亲也一定是靠着它而坚定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然而，任何一个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只要一旦被定为“牛鬼蛇神”，那将彻底地失去人身的一切自由。父亲也同样不例外，他不仅被剥夺了给妻（我母亲）写信的自由，而且也被剥夺了收取家书的自由。1966 年 9 月 14 日，即父亲被押回北京的次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写信给玲，交审查。”1969 年 12 月 2 日，即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后，日记中又写道：“我要求给南京去信，X 说要交北京的中央专案组寄发。”一封简单的平安家信，竟然也要不辞劳苦地往返数千里，为的是通过专案组的审查！那是 1970 年的 2 月 21 日，父亲在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收玲 17 日来信。而 W 交信时竟指着信封说：‘金玲和你至今未划清界限，还称你同志！’”父亲的痛苦难以言说，他写道：“我这才恍然于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居住时，收到的信上都被打了××。大概就是这‘同志’犯禁了。……‘同志’如不能称，动辄‘叛徒’、‘黑帮’相加，难道又合法么？”他无可奈何，只得——“晚写信给玲，令免‘同志’之称”。

如此的高压，无疑将摧毁掉父母亲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不敢想象，连相濡

以沫的最低要求都不能得到允许时，父母亲将陷入多大的悲哀！那种人人都是可以阅读的“公开信”，绝非是他俩的心声；地狱之中等盼新生的信念，只有在心心相印的两人之间才能真正地传递和领悟。

我敬佩父亲的勇敢，是他首先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和“违法乱纪”了——为了捍卫做人的正当权利，为了捍卫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忠贞之心，他有如机警的哨兵，随时随地搜寻着能够向南京投信的机会。在北京时，他多采用的是“遮人耳目”——或借外派劳动的机会，或借看病取药的空隙，避开监视的目光，以最快的速度将事先写好的家书投入到早已侦察好的邮筒之中。庆幸的是，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虽说已是无所不在，但是邮筒竟被遗漏了下来。于是乎父亲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总是能够“安全”地与母亲保持着数天一信的联系。

但是等到1969年底，父亲随中国作协的大批人马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以后，这一“渠道”便不复存在了。——其一，父亲所在的连队，邮筒仅有一个，而且被造反派们牢牢地看守着。尽管信箱内的信件不可能拆开检查，但信封上的地址和姓名则成了他们窥探“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重要线索。因此对于父亲来说，是很难“蒙混过关”的。其二，县城或集镇上的邮局虽说人稠众广不便仔细检查，但一则来回一趟将近20里路程，二则干校纪律严格，独自外出必须要经过连部的批准。这对于已经年逾花甲而且“阶级敌人”的帽子尚未摘除的父亲来说，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父亲不甘于失败，更不甘于受困，他决定去冒险了，去为自己闯出一条新的生路！——那天他改换了笔迹，向住在南京的他的大嫂“陈王氏”处投寄了一封家书。信上不言有关运动的任何内容，只是索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然而这封被投放到连部邮筒内的信，第二天一大早还是被有关人员嗅出了“气味”——信封下端没有写明寄信人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信封被拆开了，内容被当众宣读。那正是早上吃饭的时间，食堂门口逃脱不掉任何一个前来就餐的“牛鬼蛇神”。父亲庆幸于自己事先作好了伪装，尤其是落款处只签了一个唯有家人才知道的别名“征鸿”。然而，面对着这样一场意志与胆量的较量，尽管最终有关方面是一无所获，但也毕竟使得父亲“汗流浹背”，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敢抬头，只闷声吃饭。”

如果说父亲从此而气馁了，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后来的那些多达上千封的家书。然而新的渠道又在哪里呢？文革结束后我终于在父亲所写的长篇回忆散文《云梦断忆》中找到了答案。那是父亲的再一次被流放，流放到了片荒湖野滩上独自看守菜园子——“这一块小天地可是我的‘自由世界’，甚至一些违反干校法纪的事，也可明目张胆地干。比如说，私下写封不受检查的家信，贴好邮票，在入城必经之路的大坝上，找寻一个老实可靠的人托其进城去投寄，说可以快一

天，是不会遭拒绝的……”父亲的诙谐与幽默固然跃于纸上，然而就在这貌似轻松的口气背后，却让我读到了他的坚韧与顽强。为了能够充分地享受这一“偷”来的自由，他宁愿忍受体力上的重负和精神上的孤寂，长时间地避开人群，于空旷的沼泽中放牧鸭群或看守菜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来形容父亲所寄回来的这一封封家信，他真正是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长达七年的生离之中，父亲就是这样顽强地与母亲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他不仅以自己的必胜信念鼓舞着母亲，更以自己的勇敢行动给母亲以榜样，以支撑。（下图：相濡以沫的陈白尘、金玲夫妇在文革后期留影。）



的确，与父亲偷寄家书的困难相比，母亲为父亲邮寄信件则更加不易了。父亲身困“牛棚”，是根本不可能随意收取外来的任何邮件的，就连那种被迫写出的必须要经专案组审查的“公开信”，有时一扣也竟能达半月之久。其理由没有别的，只是怕收信人“分散精力”，不能去认真思考自己的“罪行”。母亲也曾不死心，就在父亲抵达干校后不久，她试着邮寄了一个包裹，里

面装有四瓶酱菜和两瓶肉酱，目的只是想探一探“路”，同时也为了能让父亲感受到一点点来自家庭的气息。然而包裹被没收了，父亲被批判了，尽管他一再表示这绝非是为了“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最终的结果，罐头还是被全部“赠送”给了幼儿园的小朋友。

1994年我在为父亲整理他于文革期间冒着巨大危险偷偷记下的《牛棚日记》时，突然发现他在北京期间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照例外出洗澡”的记载。这“照例”二字到底有何深意，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父亲笑了，而且很得意，他说：“这就是当年传递信件的秘密接头地点。”原来，在羸弱的母亲身上同样有着一颗不甘屈服的顽强的心。她经过反复的思索，终于设计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她将写给父亲的家书直接寄往她早年的一位同窗家中，待到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便由这位同窗的小儿子“照例”送往那个位于红岩路上的浴室之中。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估计父亲事先与母亲通了气——他试探性地向造反派提出了几项生活上的要求，总算开恩，答应了其中的一条，因为文联大楼的浴室是不对“牛鬼蛇神”开放的。至于说为什么要选择浴室作为接头地点，这无疑

来自于父亲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越是嘈杂拥挤，越是精赤条条，就越是能够保证它的安全与可靠。就这样，父亲终于能够每隔七天便欣慰地从陪他“同浴”的那个孩子手中得到一封母亲寄来的家书。“惊险吗？”我好似在听一个有关地下斗争的故事。父亲则是哈哈一笑，笑声中既有对专案人员的蔑视，更有对母亲的感激与赞许。

人们都说，爱情的力量足以排山倒海，我坚信不疑。一周一次的通信往来仍然不能满足母亲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更何况如果再逢上“十万火急”的事情，那是必定要延误时机的。于是乎母亲再次“穷则思变”，她终于又想出了另外一个更为巧妙的联络方法。

……那天很是平常，大妈和往常一样在厨房里烧饭，母亲推门走了进去。她掀开锅盖，小心翼翼地撇出了一小碗米汤。我知道自从父亲离家之后，工资也被冻结了，家中无钱再订牛奶，权当是补充一点营养罢了。不料回到卧室后，母亲却关上了房门，拉上了窗帘，举止极为诡秘。我忍不住扒着锁孔向里偷看——只见她先是拿出一张《文汇报》，继而又取出一根竹签，然后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四周的空白处匆匆写了起来。

“妈，你在干什么？”我猛地撞开了房门：“这也不是墨水，怎么能写得出来？”母亲抬起头，望了望我：“只要拿酒精一涂，就能显现出来。这是你爸干地下工作时教会我的……”她不仅没有丝毫的责怪，反而是一脸的神圣与庄重。

我的心狂跳不已，既为偷窥到了一项绝密的工作，又为发现了母亲的一个重大秘密——隔不了几天，她就要给父亲寄去一张报纸，说是上面有重要的社论，让他认真学习。至于这些邮件，则基本上不会引起造反派的怀疑——那一篇篇经常见诸报端的社论，正是他们要求“牛鬼蛇神”去认真学习的。

于是乎，在父亲的日记中开始频频出现这样的记载：“晚收南京寄来的《文汇报》”、“今天又收到《文汇报》”……真没想到啊，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这一“特工”的传递方式竟然再一次地被善良的人们所使用，而且是使用在了夫妻之间的家书上！然而就在这字里行间，分明让我听到了父亲欣慰的笑声，看到了父亲惊喜的面容。

这样的联络方式，其最大收获，要算是拯救父亲于危急之中了！——那是1968年的年初，父亲的问题“升级”了，随之则为他专门成立了中央专案组。然而就在提审之时，父亲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他于1935年出狱时的准确日期了。这将意味着什么？它的下场无疑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父亲的焦虑与恐惧可想而知，他请求专案组能否稍许提供一点线索。最后总算是开恩，让他看了一篇他自己于当年写下的描写出狱情景的散文《还乡杂记》。文章中写道：“……来到车站，买到一份报纸，打开来便看见电影艺人阮玲玉自

杀的消息。”他一跃而起，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封“密信”迅速地寄往了南京。母亲接信后，立即行动了起来，依照父亲所提供的这一线索，她从南京图书馆中查找到了当年登载阮玲玉自杀消息的那张报纸。当晚，母亲即蘸着“米汤”通知了父亲。——《文汇报》啊，《文汇报》！终于又是靠着它而拯救了父亲！

一面是人性的毁灭，一面是人性的高扬；一面是冷酷的摧残，一面是坚韧的反抗。它虽然无声无息，却百折不回、一如既往。我无法估量出在母亲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多少热、多少火、多少情爱、多少力量。她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各种各样的联络方法，只为能减轻一点父亲的痛苦和创伤。

那是后来——父亲在干校中遭遇到了“梁上君子”，他的全部寒衣都被盗走了。于是，聪明的母亲终于想到了针线——她将自己浸透了血与泪的家书缝在了邮寄给父亲的棉袄里。棉袄是中式的，只为它有一个衬有裕襟的硬领，可以藏匿起母亲的思念和深情。那天，母亲紧闭起家中的所有门窗，借着微弱的光线，吃力地做着最后的伪装。握针的右手在不住地颤抖，额头的汗珠在滚滚流淌……她在信中告诉父亲，专案组已向家人正式宣判了他的“死刑”，但她绝不相信，她一定要等盼着他的归来，等盼着沉冤大白的一天。我默默地注视着母亲的身影，却禁不住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爸怎么会知道棉袄中的秘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句：“心有灵犀一点通！”

……40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何，那碗米汤、那根针线却定格般地在我的脑海中拂之不去。我描绘不出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为父亲的不屈而感到骄傲，也为母亲的勇敢而感到自豪，但是它们给我留下的却更多的是悲壮，一种令人震撼的悲壮。

总想为父母亲写点什么，不知怎的，竟一下子想起了文革之中他们那上千封既传情又传奇的两地书。遗憾的是，迫于当年环境的险恶，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成了她终生的遗恨。父亲能够理解母亲的心情，他于病重期间亲笔为母亲写下了一幅字：

“柔情似水，意志如铁。共患共难，同枕同穴。”

如今这十六个字刻在了他们两人的墓盖上，它让我又看见了芜湖野滩上的那个茕茕孑立的身影，又看见了昏暗灯光下的那副穿针引线的面容。这似水的柔情，这如铁的意志哟！……

修改于 2012 年春末

【书海泛舟】

书讯三则

欧阳欣

孙涛著《虔诚与疯狂》（上、下册），（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4 月出版（第二次印刷）。本书通过文革时的太原五中学生刘灏（曾任文革时山西群众组织三大派之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的传奇经历，以一个人的命运为主线，生动再现了山西（主要是省城太原）文革的许多方面。正如作家赵瑜的评价：“从历史人物本事出发，留给了读者一部真实的山西省城文革风云录。”《昨天》曾在第 19 期（2013 年 7 月 30 日）上对当时正在征求意见的书稿（书名原为《虔诚的疯狂》）作过介绍。

毕星星著《山青石在：许石青评传》，（香港）中国联合文化出版社 2016 年 6 月出版。文革后期发生的《三上桃峰》事件，举国震动，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当事者之外的人知道许石青这个名字。本书就是这位“领衔《三下桃园》原创，合作过吕梁版《三上桃峰》改编，参与过进京版《三上桃峰》创作”的晋剧老编导、文革受难者的评传。作者说：《三上桃峰》事件是许石青人生的核心事件，“他一生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能把天捅下一个窟窿”，这一事件足以反映出“那个荒唐年代的全部悖谬。让我们不写文革？那等同于否定这个人的生。”然而，却有国内的出版社要求删掉有关文革的内容，“文革事件，大杀大砍，面目全非，我和传主家人都不能忍受了。此非伤筋动骨，简直杀人夺命，不留全尸。为了保存一份完整的历史记录，无奈我们只好放胆交给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见作者博客《新书〈山青石在〉出版》）

岑颖义编著《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6 年 5 月出版。本书除综合了若干校友的回忆外，还收录了一些历史资料。

【热点研究】

文革开端的武斗与工作组问题¹

陈闯创

为何以文化冠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武斗成风、暴力泛滥，以至于

¹本文曾于 2016 年 6 月在洛杉矶召开的“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感谢华新民、杨隽、何蜀对文章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当然文责概由笔者自负。

到 1967 年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¹？现有的文革研究尚未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笔者也无力对此做详尽分析²。中共宣扬的“文革十年浩劫”说掩盖了文革在不同阶段不同地点表现大不相同的内部异质性，笔者赞同何蜀将文革十年大体分为 4 个阶段的判断。本文仅限于分析文革发起阶段，即 1966 年 5 月到同年 8、9 月间的第一个阶段“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的若干重大武斗事件³。

本文所分析的暴力事件主要是武力批斗（简称“武斗”，这应该是当时武斗一词的原始含义），是当权者和群众对被冲击、批判者的集体性单向施暴⁴。据乔晞华对文革暴力的研究综述，这种武斗可算作单向暴力、垂直暴力、非建制性群体暴力、直接暴力⁵。批斗往往采用极端的摧残方式，包括丑化外表、侮辱人格、肉体摧残、精神折磨等等，比如戴高帽子、挂大牌子、剃阴阳头、用黑墨涂脸，拳打脚踢、弯腰罚跪、低头爬行、“飞机式”以致酷刑折磨，上纲上线、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以摧垮意志。笔者将通过梳理该阶段若干重大武斗事件的发展经过，展现在文革开场阶段当局引发、纵容、煽动、利用和控制群众暴力的复杂面向⁶。

一、工作组的出场

工作组（或工作队）是中共发动政治运动的常用工具⁷，而工作组最初登上文革舞台却是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垮台后的一个偶然时机，彭真是文革中在刘少奇之前落马的最高阶官员。

笔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明线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暗线则是清洗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四名高官。先后由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及其主导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

¹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第 108 页。

²笔者所见，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 年）是第一部研究武斗的专著。

³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载华夏文摘增刊第 316 期，2002 年 12 月 2 日。四个阶段是：从 1966 年 5 月到同年 8、9 月间，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批斗阶段；从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到 1968 年 9 月，群众性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从 1968 年 9 月到 1971 年 9 月“九一三”事件，革委会领导下的斗、批、改阶段；从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到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倒台，纠左与批右、整顿与反整顿反复较量阶段。

⁴这种被称作“红色恐怖”的武斗主要是政治强势人群对被批判者、被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和后来急剧升级的派别间武装冲突即派系武斗是不同的。

⁵乔晞华著《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015 年，第 251-252 页。非建制性暴力即 informal collective violence，又译作非形式性集体暴力，但如下面分析所展示的，无论是无组织的群众还是有组织的红卫兵施暴虽然都是游离于现行秩序之外的非建制性集体暴力，但同时又有着诸多建制性集体暴力渗透的特征，亦见张晨晨《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香港：《二十一世纪》，2008 年 12 月号。

⁶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武斗作为直接暴力所体现的凶残性，所谓文斗作为结构性暴力所造成的伤害更普遍、更深刻。见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印红标》，2014 年 2 月 7 日。

⁷很遗憾，学界对如此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研究。笔者分别以“工作组”、“工作队”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仅检索到 2008 年以后才出现的 3 篇硕士论文和 6 篇期刊文章。

限制，自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虽然文教“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对吴晗和海瑞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还是以学术批判为主，政治批判较少。直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透露了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由此标志着先前以文化界为主的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开始转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社会各界均参与的政治批判。批判对象也由吴晗扩展到三名北京市领导邓拓、吴晗、廖沫沙组成的所谓“三家村”，并且各地寻找本地对应的批判对象¹。可以说，这期间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处在中共的直接引导和严密控制之下，确实还局限在“文化”范围内。各地各部门均亦步亦趋地“跟风”，各自精心选取并抛出几个批判目标。

在1966年5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开展的明线、暗线两条线索通过彭真垮台而交汇到一起。彭真和陆定一各自主掌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均成为批判对象，彭陆为成员的文革五人小组被重组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也是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重要原因。但此时文化革命的内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要从文化界扩展到清洗中共、政府、军队²。彭真、陆定一垮台后，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北京大学先后出现了自发指向上级领导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从几张大字报中选定了北大聂元梓等人5月25日批判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校领导陆平、彭珮云的大字报，出人意料地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宣扬这一大字报³。毛泽东这一举动立刻引发全国震动，文教单位尤其是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不少单位的原有领导体系因受批判冲击而瘫痪。

正是在这种非常局面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被动采取了派遣工作组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局面（此前仅有极少数试点性质的工作组派出）⁴。中共在政

¹张业赏《从学术争议到政治批判——从山东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看文革的发动》，《记忆》总第148期，2016年1月31日。

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刘少奇、贺龙、康生等中共高层误以为此次会议上打倒彭罗陆杨就完成了对“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清洗，而实际上大清洗才刚刚开始。见黄峥著《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³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在1966年5月13日开始出现大字报，见《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征求意见稿]，1987年5月，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李海文《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⁴极少数地方已主动向文教单位派出工作组，但并非为预先应对尚未出现的乱局，而是进行文革试点，以收集经验。比如陕西省洛南县1966年5月23日决定在7所中小学开展文革试点工作，并相继派出工作组进驻，见《洛南县志》之“洛南县文化大革命简录”http://www.sxsdq.cn/dqzlk/dfz_sxz/lnxz/；陕西省南郑县6月1日派出工作组进驻各中学，见《南郑县志》之“文化大革命动乱纪略”http://www.sxsdq.cn/dqzlk/dfz_sxz/nzsz/；陕西省富县6月1日决定次日向县一中派工作组进行文革试点，见《富县志》之“附录第四部分：富县文化大革命纪实”http://www.sxsdq.cn/dqzlk/dfz_sxz/fxz/

治运动中由上到下派出工作组发动、指导运动本来是习惯做法，尤其是在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中更是标准动作¹。但“四清”时所派工作组往往是精心抽调人员并进行政策培训后主动派出的，而1966年6月匆忙派出的大量工作组既对文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也缺少相关的政策训练。因此文革初期的工作组虽然一时勉强控制住了局面，却也引发了更多问题。

二、限制自发武斗的工作组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6月3日奉邓小平命协助中共北京市委接管北京中学文革的共青团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北师大女附中，这两个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一个进驻工作组的大学和中学。²以这两个工作组为例，可以看出他们在制止学生武斗中的作用。

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实为限制群众运动的8条要求，其中就包括“不许打人、污蔑人”。会议同意了李雪峰的意见，刘少奇还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³。6月3日晚李雪峰就召集北京市各中学领导和师生代表开会宣布这8条规定，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当夜12点专程到北大传达李雪峰的指示⁴，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6月4日在校内传达李雪峰讲话，可见事态之紧急，恢复秩序的需要之迫切⁵。

工作组沿用以往政治运动的策略，划定批判对象，发动群众进行批斗。运动的“革命动力”仍然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积极分子，运动的“革命对象”除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反复打击的各类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外，又加上一些经上级批准后抛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人⁶。运动的“武器”主要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的“主战场”是各类斗争会⁷，比如在学校里，大型斗争会就是全校师生都参加，小型斗争会就是小组会可能仅有十几个人而已。

李雪峰6月3日讲话，这8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1. 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

¹对四清工作队的研究，详见刘彦文《“四清”工作队工作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²李红云《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记忆》总第90期，2012年11月30日。

³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152页

⁴邱心伟、原蜀育编著《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10页。

⁵《1966年6月4日胡志涛传达市委新领导召集北京市中学书记、校长、老师、学生代表的会议》，见《记忆》总第112期，2014年4月30日。

⁶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316期，2002年12月2日。

⁷孙月才著《北大：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往街上贴，有留学生的学校还要注意内外有别；2. 各种会可以开，但不要在街上、在有外国人的地方开；3. 不要上街，不要包围（被批判者的）住宅；4. 声援别的学校，最好是送大字报、写信，不要派人去；5. 国内外要加以区分，大字报，开大会，要分别贴，分别开；6. 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7. 不准打人，不准污辱人；8. 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抓要害，私生活不要贴大字报¹。

很显然，工作组虽然要“放手发动群众”，但实行这8条规定则必然是运动群众、不相信群众、限制群众运动。正是这种矛盾引发了不少工作组和群众之间的冲突。工作组想恢复和稳定“革命秩序”，但实际结果则往往是局面“冷冷清清”，和《人民日报》上鼓噪的大革命气氛显然不一致。上面提到的8条规定并没有正式成文，而是口头传达下去的，所以各地传达版本不一，直到北大的6·18事件后中共才正式行文限制自发武斗即“乱斗”。

6月17日早晨至6月18日凌晨两点，北大的学生到处围住“黑帮”，6·17北大的斗争会上发生“流氓行为”，以及把红墨水洒到被斗人身上再拉到校外游街。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将40多位党团干部、教师等“黑帮分子”拉出来批斗，并发生了往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情况。当时情况比较混乱。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当晚张承先为此向全校训话一个小时，称要严防“坏人”大破坏、制造大混乱。²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³。刘之所以这样批示，自然是因为北大“乱斗”现象不是孤例，而是较为普遍。

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6月3日进校后没几天就立刻提醒学生，注意“不要围住那些被揭的人，要贯彻政策，不要打骂人”⁴。但6月21日和22日该校连续两次揭发批判本校头号“黑帮”卞仲耘大会上都出现了暴力现象，卞因所谓私生活和“假共产党员”问题引起激愤，在会上就被学生殴打。工作组对此的态度是“打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消灭她”，“（打骂）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可能被敌人利用”⁵。

6月10日晚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停职反省的消息传到清华，清华当局受蒋的牵连立刻被冲垮。6月12日清华学生就自发抓出“黑帮”和“保

¹ 《1966年6月3日李雪峰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² 孙月才著《北大：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39页。

³ 196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上册第49页。

⁴ 《1966年6月6日张世栋传达胡克实同志的报告》，《记忆》总第112期，2014年4月30日。

⁵ 《1966年6月22日张世栋在第二次“揭批卞仲耘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3日张世栋讲话》，《记忆》总第108期，2014年2月15日。

皇派”斗争、戴高帽游街，工作组出来解围、把高帽子摘下，说这是不讲政策，自控系的工作组副组长还说“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¹。6月15日清华学生又从澡堂里抓住校中共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共青团委书记张慕津，进行批斗、游街，到6月17日戴高帽游街的才少了些，6月19日刘少奇妻子王光美进驻清华，工作组对学生讲要区别对待、注意批斗方式，6月20日清华传达了北大6·18打人事件²。

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7月3日汇报北京市文革情况，他专门讲到了群众暴力情况。他说群众出于“革命热情和对黑帮的痛恨”，前一段时间打人、戴高帽子、游街等相当多，根据北大、北师大、清华等九个院校的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一日到二十六日，校、系两级被斗、被打、游街的领导干部有一百三十八人。但郭影秋又说在6月20日左右“在野右派”纷纷而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事端，除了北大6·18事件，北京师院也发生了一天之内被戴高帽子、斗争、集体游街的达一百三十多人的现象。当时地方当局的态度主要是怕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担心首都外宾多，怕斗错了人等等。其实郭也是难以决断，他先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先让它乱一阵子，再一分为二”，又说“如果听任敌人制造事件，乱的时间太久，延续太长，对运动发展也很不利。”³

三、发起、煽动和操纵武斗的工作组

一般来说，工作组为恢复和稳定秩序是限制群众自发揪斗和打人（即“乱斗”）的，但工作组却可以有计划地将暴力作为政治运动的工具，这种情况较为常见。事实上有不少恶性武斗事件与工作组有关，工作组或是主动发起、许可暴力批斗，或是煽动、鼓舞武斗，或是放纵、利用武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受到暴力折磨的对象，既有原本就是主要批斗目标的老师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也有新出现的敢于挑战工作组的学生，甚至扩展到社会上的民众。轻者身心摧残，重者无辜丧命。

1. 工作组发起武斗迫害老师

依据分布于二十四个省市区的上百所中学的校史、大事记、地方志及其他资料，杜钧福简要分析了中学工作组的情况，他指出：在工作组进驻后，广大教师受到政治和生活上的迫害，包括批斗、抄家、殴打、关牛棚、劳改；这些材料中记载了至少18件受迫害而死亡的事件（包括自杀）；在宁夏吴忠中学，许多老师（至少二分之一）被管制起来，有的还被皮鞭抽，打耳光，戴高帽子，站高凳子，

¹ 邱心伟、原蜀育编著《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15页。

² 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7、9、10页。

³ 《1966年7月3日郭影秋关于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汇报要点》。出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举白幡，抄家；在福建武平一中全校批斗声讨大会上，16位教师被强迫戴上黑牌子、九十度弯腰、下跪、晒太阳¹。

工作组不仅以学校为单位在校内发动学生整老师，自1966年7月中旬起还趁着放暑假的机会把中小学老师集合起来进行整训。集训中小学教师与刘少奇关于“中学文化革命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的意图有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7月6日前就得到上级指示说“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在社里开三千会那样，集中交代问题，学生派代表”，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刘少奇对于规划提出的集训中学师生的办法说“中学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来（指集训）没法讲通道理。搞集训不但便于掌握政策，也便于打通老师、学生的思想”²。

尽管刘少奇说集训便于掌握政策，但实际上集训往往是残酷斗争暴力泛滥。比如：陕西北强县1966年8月1日抽调120余人组成工作组把全县1100余名教师集中起来整训，结果737名教师受到批斗，45%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对“拒不交待”或“认罪态度不好”的所谓“顽固分子”，轻者罚跪罚站，重者拳打脚踢，被斗得神经错乱、终身不愈者有之，撞墙、触电自杀者有之³；广西灵山县1966年7月至8月间集训中小学教师2526人，大揭、大批、大斗，共揪出518人残酷批斗，导致自杀死亡10人，伤残86人⁴。

根据杜钧福对陕西省集训中小学教师的研究，陕西各县市中共党委几乎都派出工作组，召集辖区内全部中小学教师进行集训，而被工作组定为批判对象者往往受到残忍的对待，由“触及灵魂”的文斗发展到“触及皮肉”的武斗，比如“揪头发、戳脸、打耳光、卡脖子、揪耳朵、陪斗碰头、罚跪晒太阳、淋雨、皮鞋踢等等”，不少人不堪摧残而自杀⁵。笔者一一查阅陕西省112份县志，发现其中记录了25个县在集训中发生人员死亡，累计至少51名自杀者和另外4名未注明死因的死者⁶。在广西，中共广西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文革爆发后不久就向中小学教师挥起屠刀，他说“中小学教师要清理一部份，有些要法办”⁷；集训中的残酷批斗逼得一些老师自杀、成为文革第一批血祭品，引人注意的是广西集训中充当打人凶手的还包括中共派去的学生代表。宋永毅指出这种以“集训”为名义开展的迫害是相当普遍的，值得探究共产党领导、指挥下的“学生打老师”与稍后“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间的关系⁸。

¹ 杜钧福《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昨天》第9期，2012年9月30日。

² 《惠庶昌整理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和《1966年7月13日刘少奇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³ 《宁强县志》之卷二十五“文化大革命记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

⁴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⁵ 杜钧福《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昨天》第11期，2012年11月30日。

⁶ 各地方志均见于陕西省地情网，<http://www.sxsdq.cn/dqzlk/index.htm>

⁷ 《钦州地区文革大事件》，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⁸ 宋永毅《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序，美国：明镜出版社，2014年。

2. 工作组煽动、纵容武斗以镇压质疑工作组的学生

工作组虽然一般是反对学生自发揪斗“黑帮”，但在镇压敢于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时却并不手软。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挑战工作组的学生被逼疯、被逼自杀，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仅举最为有名的三例如下。

6月6日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学生以团支部书记李世英为首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组“十大罪状”，说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交大学生会主席杨克剑、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等带领一些学生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请他解决交大工作组的问题。1683人在一份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上签名，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工作组（后升级为工作团）在西北局指挥下立即就此事做出严厉反应，在接下来一个多月里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全校1000多人被批斗，66名处级干部中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为“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75%。李世英等人被戴高帽子游街，6月9日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脱险，7月9日王永婷不堪批斗跳楼自杀身亡¹。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李世英印象深刻，直到1967年还在一份文件的批语中称李世英是“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²。

李世英所在的工物系即原子能物理系在当时是绝密专业，原子能专业的学生出身都是审查最严的，即最红的、最受当局信任的。文革初期敢于最早站出来写大字报表达异议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类出身好的学生，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他们积极投身文革就是要以此表明响应《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共最高舆论部门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只是恰巧由于中共内部争端，他们这种行动超出了地方当局所布置的范围，即“群众运动走在了领导前头”才招致了镇压。实际上，他们反工作组仍然是自认忠诚于、保卫共产党政权，在李世英的遗书中这一点表现的最为明显：“希望调查清楚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要反党？还是要保卫党？”“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按：党即指中国共产党），但这一点往往轻易为后人所忽视³。工作组与群众的矛盾来源就在于宣传上说是“放手发动群众”，但实际上共产党的策略从来是运动群众。文革初期舆论高涨与组织限制就发生了冲突，《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

¹范效良主编《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4月；凌安谷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之“1966年5至12月”，<http://58.206.125.28/?p=4339>

²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语和注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³一丁（武彩霞）《从三封遗书说起》，破土网，2016年4月12日。

黑帮》等社论，点火于基层。而工作组进校后，为恢复和稳定秩序，一般的效果是使得校园“冷冷清清”，以至于镇压群众。

清华大学发生“六二一事件”。6月21日工程化学系（即原子能化工系）大三学生蒯大富公开提出革命左派要考虑现在掌权的工作组是否代表我们，代表则拥护，不代表则夺权。为此，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当即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的上级薄一波则打来电话指示“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工作组要反击”。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反蒯斗争”中，5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又称“蒯氏人物”），700多人被批斗¹，青年教师史明远因翻印北京林学院学生《与（中共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被批斗而服毒自杀身亡²，学生朱德义卧轨自杀被压坏了两只脚³。

文革初期最早的最大规模暴力事件是兰州的“李贵子事件”，中共甘肃省委在此事件中的责任最为明显，先是在6月中旬迫使工作团支持武斗镇压学生，继而在8月初撤离工作组后抛出工作团成为武斗对象。兰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李贵子被中共甘肃省委树为革命左派，在6到8月间的70天内在省委支持下先后批斗反工作组者、支持工作组者，在兰州大学以致兰州市内制造多起大规模暴力流血事件，其间兰大校长江隆基被批斗后于6月25日自杀，但到8月中旬局势逆转，李贵子逃亡在外，引发全国通缉，轰动一时。

6月7日兰州大学不少师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而此前已被甘肃当局树为“革命左派”的兰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李贵子表示支持工作组，引发数千人参加的大辩论。甘肃当局次日立即将工作组扩大为工作团，并将“六七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由此开启了所谓“七十天白色恐怖”。6月13日兰大工作团提出要制止已出现的严重打人现象，但遭到中共甘肃省委批评，被迫于6月17日宣布收回13日的报告，称“同学们不要受‘过火’的约束，要大胆的干，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日兰大发生轰斗殴打高潮。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制止打人报告（应该就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但拒不向下传达，理由是“现在不斗，以后政策下来就斗不成了”。6月27日兰大一天就斗了一百七十多人，二十八日又斗了二百一十多人，达到学生斗学生的高潮。兰大在整个白色恐怖期间共斗打一千零三十八名师生，自杀六人，自杀未遂十四人，逃跑三十八人，下落不明三人⁴。

3. 首都工作组操纵利用红卫兵武斗

¹ 唐少杰著《一葉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²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1967年12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³ 朱德义《把仇恨凝集在刺刀尖上——在清华大学斗争王光美大会上的发言》，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

⁴ 兰州铁道学院机械系机车战斗组编《兰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2月25日，出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在红卫兵犯下的诸多暴行中，自 1966 年 8 月下旬起十余天内北京市红卫兵破四旧和活活打死上千名市民一事最为骇人听闻，却被称为“红八月”事件。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红卫兵就犯下如此暴行，无怪“红卫兵”这个名词将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宋永毅早就注意到老红卫兵是为当局所用，充当了“净化北京”迫害计划的法西斯式先锋队¹，近年来披露的资料则进一步证明当局在操纵和利用红卫兵恐怖行动中扮演的角色。

这桩大规模打人事件是在破四旧运动中出现的，而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开始不过是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而已，并没有明显的大规模暴力，但在北京突然就很快转向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种转向和当局的布置有密切关系。和外地不同，北京的“破四旧”运动同文革初期中共保卫毛泽东、防止政变的行动联系在一起。

为加强警卫，1966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批准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叶剑英任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工作组七项任务分别是：一、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看守和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²。资深红卫兵运动研究专家米鹤都明确指出，红卫兵运动兴起后破四旧就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破四旧正是保卫毛泽东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上述 3、4、7 项对政府机构来说因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住所不方便实施，而破四旧的红卫兵却可以堂而皇之不受约束地公开执行这三项任务，第 5 项任务更成为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³。

实际上，红卫兵们抄家打人除了少部分是红卫兵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都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奉命引导下发生的。直到红卫兵打死上千人后，中共北京市委才发出《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现行犯和五类分子的名单⁴。事实上除基层国家机器支持红卫兵的恐怖行动外，众多中共高层诸如周恩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也是乐见红卫兵把矛头指向政治贱民，支持红卫兵制造短期恐怖气氛的⁵。8 月 25 日发生了所谓反动资本家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的假案，第二天周恩来即接见红卫兵说“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样帮助你们”，帮助办法就包括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有组织抄家，并派军警保护红卫兵抄家，9 月 12 日北京市法院还奉周恩来命令判处李文波之妻死刑⁶。大名鼎鼎的西城区红卫兵

¹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当代中国研究》，2002 年第 3 期。

² 张民著《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

³ 米鹤都《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华夏文摘增刊第 827 期，2011 年 12 月 6 日。

⁴ 胡鞍钢著《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 年，第 348 页。

⁵ 杜钧福《“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记忆》总第 58 期，2010 年 9 月 30 日。

⁶ 1966 年 8 月 27 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纠察队 1 号人物孔丹也承认 8、9 月的乱象和暴力似乎是上层有组织推动的¹。

四、工作组撤离后的恶性武斗

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是文革中已知最早两起打死批斗对象的事件²。南京“八三”事件，是指 1966 年 8 月 3 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揪斗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他的妻子、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造成李敬仪当场死亡、吴天石抢救无效两天后死亡。北京“八五”事件，是指 1966 年 8 月 5 日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残酷斗争、殴打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造成卞仲耘遇难。虽然外界早就注意到这两起事件，但出于不同的原因，直到近几年，人们才对于这两件事有了比较详实可靠的了解³。

根据现有材料，这两起事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相似之处：

1. 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都是学生，而且不是红卫兵⁴；
2. 遇难者都是教育界领导，而且已经被相当高级别的官方定为主要批判对象；
3. 暴力事件都是发生在工作组刚刚撤出各自学校之后。

在南京，1966 年 7 月 8 日至 16 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 20 篇文章批判所谓“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教育厅长吴天石，7 月 9 日至 29 日中共南师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吴天石之妻李敬仪⁵，与此同时批判吴天石的文章还发表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⁶；在北京，1966 年 6 月初共青团中央派工作组到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进校不久即仿照“四清”运动中的做法将校最高领导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即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召开揭批大会批判卞仲耘，当时直接联系并指导女附中文革的邓小平是知道并且同意这些做法的⁷。

华新民明确提出触发南京“八三”事件和北京“八五”事件的是同一个信号：

年版；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当代中国研究》，2002 年第 3 期。

¹ 米鹤都《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选载之一）》，华夏文摘增刊第 963 期，2014 年 10 月 20 日。

² 也可能有类似案例更早发生，但至今不为人知。此前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受难者被批判后自杀。

³ 保存于南京师范学院的八三事件相关档案原件流出档案馆后为人所发现，公布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华夏文摘增刊》第 879 期、2013 年 2 月 28 日《记忆》第 94 期。相对而言，卞仲耘事件更加广为人知，近年来由于众多亲历者的叙述和研究者的探讨，此事的大致情况已然清楚，但核心细节如行凶者的姓名仍付之阙如。

⁴ 陈闯创《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兼谈宋彬彬的道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〇二五期，2016 年 4 月 4 日。

⁵ 1980 年 4 月 13 日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南师八三事件的调查报告》，见 2013 年 1 月 21 日《华夏文摘增刊》第 879 期。

⁶ 陆晨《〈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是一株大毒草》；蓝云祥、李大成《这是一本毒害青年的坏书》，《中国青年》，1966 年第 13 期。

⁷ 1966 年 7 月 5 日《邓小平对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谈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年版。

撤工作组，而不是什么红卫兵运动或造反派起事¹。既然工作组之前限制群众自发批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那显然撤销工作组就表明文革运动要进入新阶段，不再是稳定秩序、强调政策，而是取消限制、允许群众更积极地参加运动。那么自然，在比赛革命、争夺正统的氛围下²，原来亲工作组的学生们就会采取暴烈的行动来洗清自己之前支持工作组的错误，而原本反工作组的学生则不需要这种新的激进行动来展现自己。南师的大学生说如果当天不行动，“怕第二天有新政策干不成”³；北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同学为摆脱曾支持工作组的形象，积极去批判校领导⁴。卞仲耘、吴天石、李敬仪等人早已是官方抛出的重点批判对象，“痛打落水狗”就成了表现革命态度的最好机会，工作组撤出后主持学校局面的，无论是老师、学生或原有权力机构，都不敢或难以阻止群众的自发暴力。

事实正是如此，在工作组刚撤离后很多学校都出现了学生自发地批斗原批判对象的事情，而且暴力大大升级。在南京，1966年8月3日上午南京大学刚刚传达撤离工作组的决定，该校生物系学生就自发游斗校领导和教授等“黑帮分子”，南师“八三”事件档案中的调查报告屡次提及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当天的揪斗影响和促发了南京师院学生的行动⁵；在北京“八五”事件前一天，北京四中就发生了“八四武斗”，由此引发该校的暴力升级，以至于数十年后无论是打人的学生还是被打的老师都对此事留下了深刻印象⁶，而8月4日师大女附中即已残酷殴打校领导，胡志涛去上级求援，但被推脱。8月13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刚刚撤出，当天工物系就批斗系领导，戴高帽游街⁷。

在南昌，江西师范学院工作队于8月9日宣布转交领导权，8月11日上午该校支持工作组的学生就自发抓了上百名原先被大字报批判的人在校内游斗。被抓者除被要求打赤脚外，又得卷起裤子到膝以上，以便下跪时皮肤着地。每走几十米就得下跪，每当命令下跪时，就有人去按头、踢脚、打拳头。8月份正值“火炉”南昌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当天室外气温近40℃⁸。校园水泥路和水泥红场热浪滚滚，发出令人生畏的滚烫，不管是脚掌还是膝盖，只要触及到它，无不被烫得血肉模糊、血迹斑斑⁹。有三名被批斗者黎仲明、周天柱、熊化奇当场死去，

¹ 华新民《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南京“八三”事件档案〉引起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八二期，2013年2月12日。

² 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

³ 1966年8月9日《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三十一）》，见华夏文摘增刊第879期，2013年1月21日。

⁴ 王友琴《清野的野蛮》，载《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北京出版社，1988年9月。

⁵ 1980年4月13日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八三”事件的调查报告》，见华夏文摘增刊第879期，2013年1月21日。

⁶ 刘东《我亲历的四中文革》，《记忆》总第52期，2010年6月30日。

⁷ 孙维藩著《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⁸ 江西师范学院1964级学生吕峻查阅了江西气象历史资料，称1966年8月10日是南昌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气温最高日，达39.7摄氏度。见吕峻《三幅题词背后的故事》，2015年2月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1f9a130102vkd.html

⁹ 江西师院中文系时年69岁的李鸿翱是被游斗者之一，他儿子在现场看到：“跪在滚烫水泥地上的老师烫出

另有一人何基不堪折磨当晚自杀。这就是骇人听闻的“8·11”事件，当时即引发校内激烈争论，一派认为“8·11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是工作组的功劳，好得很”，另一派认为“8·11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政治事件，是工作组执行极左路线导致的，糟得很”，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导致校内群众的派性分化和对立，师院的两派斗争后来成为江西全省的文革焦点之一¹。

目前已知1966年8月上旬自发暴力蔓延最广的是在上海各高校，时称“斗鬼风”。8月5日晚，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市委所派工作组，但在此之前上海就有学生通过信件等渠道了解到北京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新动向²。8月4日华东师大学生率先把“牛鬼蛇神”抓出来示众，戴高帽子游街，当天被揪斗者194人，占全校教职工11%，结果1人受折磨而死，另外4人自杀（两人死亡，两人获救）³。面对形势变化，杨西光意识到华东师大这股“斗鬼风”可以为我所用，遂将此风吹向别的上海高校。杨西光问中共复旦党委：“（华东）师大斗了，你们为什么不斗？”过了不久，又打电话催问：“斗了没有？”听说没斗，杨指责“为什么不斗？！”于是，中共复旦党委书记王零慌忙布置批斗教授、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⁴。8月5日复旦刮起“斗鬼风”，其中尤以8月6日“斗鬼风”给当事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直到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天就通过广播传达，复旦“斗鬼风”才停歇下来⁵。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斗死，物理系讲师毛青猷、生物系教授谈家桢的夫人傅曼云受批斗后自杀。不过当时就有复旦学生指出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是校方面对撤销工作组导致的形势变化而故意转移学生注意力的策略⁶。

紧接着，8月8日至15日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校相继出现大规模的对受批判者戴高帽子、游斗、殴打现象。8月8日同济大学中共党委书记王涛、副校长李国豪在内的上百人被戴高帽、挂牌、游街，人称“八九”事件，引发同济全校对文斗和武斗的辩论⁷；上海财经学院19%的教职工被戴高帽，上海体育学

巨大的血泡，痛得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豆大汗水向下流，有人忍不住悄悄挪动到水泥板块的缝隙处，一旦发现，立即招来一顿鞭打。结束跪晒时，水泥地沾连着脱落的皮肉和鲜血。每个人膝盖和小腿正面的迎面骨都烫出了四个血肉模糊的大伤口。”见《“8·11事件”四十四周年的回忆》，2010年8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1b7510100ks77.html

¹《江西师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摘自《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²曹卫平《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2004年5月7日，<http://bbs.tianya.cn/post-no01-99607-1.shtml>。文中提到复旦校方为封锁消息，就让政治指导员贴出大字报《推荐北京一封信》，说北京来信是谣言而已。

³《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红卫兵运动》，载《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⁴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11月，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⁵雷群明《复旦日记364、十六条发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7d7fd0102vm6r.html

⁶江帆《见证复旦园“斗鬼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69&pid=2340>

⁷同济大学路桥系教师王午生、沈庆均、易建国、潘洪莹编，《同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

院教授中 60%被揪斗、殴打，上海外语学院八十多名被揪斗者被迫在煤屑跑道上爬行，上海第一医学院揪斗 123 人并抄家¹。

1966 年 8 月上半月发生在南京、北京、上海、南昌的上述多起恶性武斗，都是在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出现之前就发生的，基本上是群众自发暴力，而且施暴者相当多在当时算是“保皇派”，是以暴力镇压政治贱民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但在官方不再强力压制甚至转而利用煽动的情况下，暴力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待到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专门接见红卫兵，尤其是中共开动舆论机器大肆鼓吹红卫兵及其所谓破四旧的壮举之后，全国范围内暴力急剧升级，各种自发或官方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替自发的群众成为施暴的主角。笔者赞同王友琴所总结的导致 1966 年 8 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三个因素，即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中共领导人对暴力行动的认可²。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无论是 1966 年 8 月份上半月群众自发暴力兴起，还是下半月转型为红卫兵有组织的“红色恐怖”，中共都应该承担最重要的纵容、煽动和利用之责任。

五、毛泽东和中共对暴力的放纵和利用

正如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书名所意味的那样，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国家暴力机器的终极操纵者，他对于文革中的各种武斗，无论是批斗型武斗、群众组织间武装冲突、专政机关或群众组织审讯时的酷刑折磨，都应该承担首要责任。

当文革还处在中共党内发动阶段尚未推向全社会时，就先后有毛泽东极为熟悉的三名高级部属罗瑞卿、邓拓、田家英自杀（罗未死成）。1966 年 5、6 月间毛泽东就对他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³毛此时所设想的死法显然还以自杀为主，即便如此毛仍然是大大低估了文革的疯狂，丁抒估计仅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所估计“千把人”的一百倍⁴。

毛泽东对自杀者毫不同情的态度是一贯的，1966 年 3 月 18 日罗瑞卿自杀但未死成的消息立刻传至在杭州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氏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宣布继续开会，令在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

年 10 月 14 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年版。

¹ 以上数据出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 1994 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三章，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I》第 83、84 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年。

² 王友琴《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华夏文摘增刊第 246 期，2001 年 1 月 3 日。

³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出版，1994 年。

⁴ 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华夏文摘增刊第 372 期，2004 年 3 月 15 日。

澜涛深感寒心¹。1966年8月2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湖北头号人物、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²

1966年6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流传开来，毛说“（共产）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³这段话对于文革初期的暴力扩散尤其是自发打人事件频发起了极坏的作用。

6月23日，李雪峰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说：“准备人家打你几下子，甚至给你戴高帽子。还是毛主席说的，如果你是坏人，打了活该；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那是光荣的；好人打了好人，那是误会，可以消除误会，不打不相识”⁴。

7月19日毛泽东关于对打人要阶级分析的讲法传到北大，当时被称为“毛主席对北京大学群众运动的指示”⁵。至迟7月26日这段讲话传到清华大学，8月2日清华有的系在“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旗帜下又发生打人事件⁶，但其间在7月29日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全校大辩论时，拒不回答学生提出的“你为什么删掉毛主席关于怎样正确对待打人的四句话”的问题⁷。

7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兰州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常务书记裴孟飞强调了由第一书记汪锋从北京电话传达回来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要再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并重复两遍。7月29日汪峰传达要撤出工作团，8月1日、3日兰州大学李贵子先后带领数百人、数千人以赶走工作组为名，以“好人打坏人，活该”为依据，到兰大附中、兰州十六中和兰州铁一中三所中学残酷殴打中学生和工作组员数百人，尤其是“八三”事件在当时迅速传遍全国，但中共甘肃省委均以“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为由坚决支持李贵子的“革命行动”，称“兰大

¹ 思涛编《刘澜涛生平纪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

² 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华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³ 《1966年6月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⁴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76年10月)”》[征求意见稿]，1987年5月，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⁵ 所传版本是“好人打了坏人是活该。你是好人，右派打了你，是光荣的。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见孙月才《北大：悲歌一曲——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毛到底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这段话还不清楚，印红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猜测毛在1949年前针对群众运动中打人现象讲过。笔者猜测毛应该是在1966年6月杭州会议期间针对北京的打人现象讲的这段话，这就能更好地解释为何李雪峰6月23日援引毛的讲话，郭影秋7月3日说“主席指示得很正确，先让它乱一阵子，再一分为二”，7月19日北大得知此段讲话时称这是毛对北大群众运动的指示。

⁶ 所传版本是“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坏人打好人，光荣！”见《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36、46页。

⁷ 清华大学《向日葵》战斗小组《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第一号大扒手》，1966年8月18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同学打得好，打得准，打得对”¹。

前面提到的江西师大8·11事件当天清晨，学校里贴出了据说是北京大学学生给南京大学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称林彪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大字报还介绍了北京大学6月18日斗“黑帮”，抓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校园的情景。该大字报为当天将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制造了舆论，起了引爆作用²。

从1966年8月上旬前当局有组织或群众自发的残酷批斗，到8月下旬后大量出现的红卫兵“红色恐怖”，挨斗对象的政治贱民身份是固定的，但武斗发起者的身份有了变化，这导致挨斗者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进一步升级。按照徐贲的说法就是“上层的权力斗争非但没有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性暴力，反倒双倍地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恐怖性，直接暴力迅速成为社会显性暴力”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直接看到王海光所说将上层政争和下层现状互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必要性，“高层决策的效果好坏由底层百姓承担，而底层状况的反馈也影响着高层决策”⁴。毛泽东批准发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意外引起基层动荡，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稳定秩序；毛观察到工作组导致运动冷冷清清后，就否定刘的意见撤出工作组；工作组撤离后，原保守派需要积极表现，澄清自己，就打黑帮。

事实上，无论是结构性暴力还是直接暴力，毛泽东鼓吹暴力及为暴力开脱的具体言论、安排都对暴力蔓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对待暴力和自杀（其实是被迫自杀，但当时恐怕很少有人这么看）的态度并不仅是他个人的道德问题，还同他的政治设计大有关联，因为毛泽东决心在文革中运动群众、不怕天下大乱。1966年6月上旬刘少奇、邓小平到杭州请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问题时，毛就反复讲“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不一定派工作组”、“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⁵，7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致信在上海的江青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王年一认为这封信是理解毛泽东对文革设想的两把钥匙之一⁶。

在工作组时期毛泽东关于天下大乱的设想并未为中共官僚体制所理解和贯彻，但毛关于“对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言论已经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促发了群众暴力。自1966年7月底首先撤销工作组后，毛泽东为实现以大乱求大

¹ 兰州铁道学院机械系机车战斗组编《兰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2月25日，出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版。

² 《江西师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摘自《江西师范大学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³ 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爱思想网，2004年8月7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768.html>

⁴ 王海光《答客问：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记忆》第136期，2015年7月31日。

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93页。

⁶ 另一把钥匙即毛泽东所谓五七指示，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郑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虽然毛致江青信的真实性一直有人怀疑，但毛泽东以大乱求大治的想法与他文革前后的一贯表现是一致的。

治的设想，继续采取众多步骤来煽动、纵容暴力，取消或推迟对暴力的限制。

中共中央 1966 年 8 月 8 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是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革纲领性文件，其中就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在运动中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引人注目地援引了毛泽东 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经典语录“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引文明显是在鼓吹暴力，因为引文原文的下一句就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起草这份文件时，来自军方的副组长刘志坚就特意要求删掉这句话，因为他担心民众会模仿 1927 年时农民斗争地主那样乱来，但组长陈伯达坚持要保留这段话，说毛的话没有过时，要革命就不能怕乱¹。

“十六条”中不仅有上述煽动暴力的话，还有减弱对暴力限制的规定。比如关于经常被人引用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就出自“十六条”的第六条“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一“在进行辩论的时候”的限定，经常被解读为在其他场合的武斗是不受限制的²。应该说这种解释并非狡辩，而是符合“十六条”原意的。四清运动是文革前最重要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其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中明确说到“在运动中……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到了文革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中对暴力的限制既大大减弱，限制由整个运动缩小至仅在辩论时，提法也变成抽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据参与起草“十六条”的张平化说，这个重大变动正是毛泽东作的³。

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 月 5 日毛泽东下令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而这个文件和批语恰是限制打人的。

应该承认在打人问题上，中共的态度是复杂的，并非单向的或鼓励或制止。毛泽东在以阶级分析为借口对打人行为开脱时，也说过“以后不要打人”。但制止打人显然是需要有实际威慑力才行的，毛并不怕天下大乱，只要挨打的人“该打”、乱局有利于“大治”，毛是不会出手制止打人的，正是他这种“来一个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暴力急剧扩散、升级⁴。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时，

¹ 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1999 年 3 月。

² 1966 年 8 月 10 日，分管工业的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就说“十六条中说的在辩论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指在辩论会中，对牛鬼蛇神就要武斗”。见兰州铁道学院机械系机车战斗组编《兰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 年 12 月 25 日，出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年版。

³ 1966 年 8 月 31 日张平化在湖南大学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 年版。

⁴ 1966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李富春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被毛找去汇报情况，无力控制红卫兵暴力局面的吴德希望毛能出面刹一刹这股风，但毛以超乎常人的思维说到：“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¹事实上在破四旧刚开始时，毛就在196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当天毛还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²。

8月22日公安部上报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决定，当天就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全国。公安部长谢富治稍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和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是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狱）？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³

不管是“恢复革命秩序”，还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都是建立在中共垄断暴力机器（军队、警察）的基础之上。区别在于，刘少奇要通过上级派下来的工作组尽快恢复下级中共党团组织权威，在这过程中要清洗上百万人⁴，毛是要借助群众运动先清洗中共官僚，然后以军管强行清场。毛泽东之所以不怕天下大乱，就在于他有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势力的支持，可以说是军队而不是学生才是毛发动文革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可笑的是，毛泽东以反修正主义、防政变为口号发动了实为大清洗的文革，打烂了中共官僚制却被动建立了更为保守的军事官僚制⁵；毛对这种“军事官僚专政”的不满继而引发了林彪牵涉其中的未遂政变⁶，导致中共官僚制的回潮，等到毛死后终于由中共官僚和军事官僚合谋以政变的方式结束了文革。

2016. 4. 29 第一稿

2016. 5. 2 第二稿

2016. 5. 16 第三稿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5页。

³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3页。

⁴ 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⁵ 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3期；

⁶ “军事官僚专政”是苏联对中共九大后政治体制的评价，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以不在乎的口气援引了这个评语，但事实表明毛对此评价耿耿于怀。见1969年5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的两次讲话的通知》，中发〔69〕21号文件。

他追求生命的厚度 ——怀念陈蔚德老师

何 蜀

一

有个成语叫“如坐春风”。每与陈蔚德老师聊，听他侃侃而谈之后，就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结识陈蔚德老师的，介绍我去见他的是张鲁（后来重庆电视台有影响的编剧，不幸因车祸致残，2010年去世），当时张鲁正在西南师院中文系带薪读书，而我刚从钢厂调到广播电台做编辑。我不知道张鲁是通过什么关系认识陈蔚德的，他称“陈哥”，而我称“陈老师”。张鲁常约几个朋友到陈家去“听课”，听陈蔚德讲传统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张鲁知道我对文革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我们曾一度打算合作写文革题材的电影剧本但未进行下去），特地介绍我与陈蔚德老师相识。（右图：陈蔚德先生遗像。）



陈蔚德老师家当时还在重庆老城区长江岸坡上那条俗称大梁子的新华路，是那种老式的依傍岸坡修建的房屋，从马路边进门后往下穿过昏暗狭窄的楼道才能进入他住的小房间。陈老师自从因文革问题被“逐出”外交部后，见到我这样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人，如逢知音，第一次就毫不避讳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许多他所经历的外交部文革往事。他后来在讲解导游工作时常用“锦心绣口求友声”一语，其实他与我聊文革历史，也是在“求友声”。

在忘情投入过文革的造反派人士中，文革之后没有受到打压惩罚的可能极少。但陈蔚德老师一点不像有些人那样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回到重庆后，他被安排在市府外事办公室，面对刚刚开始开放形势下出现的海外旅游者，已年近不惑、当年为周恩来、陈毅做翻译的大牌译员，被安排去带团做导游，他就脚踏实地“从零开始”，从到机场、车站接旅游团队（多是海外华人或外国人），到安

排住宿、订购车船机票等琐事做起，同时大量读书（最初不好买书时还大量借书抄书）、实地考察，并向旅游者请教学习（比如向一些归侨老人了解抗战陪都的一些旧址历史），以后又扩展到旅游的组织管理、旅游文化的研究等方面。他一开始就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比如，在重庆做导游，免不了要讲大足石刻。他在北大东语系读书时，听过季羨林、金克木、任继愈等名师讲佛教、佛学的入门知识，他找出当年的听课笔记，重新阅读，再次“入门”，同时又扩展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搞清楚佛教的起源、教义，北传、南传、藏传佛教的区别，大乘、小乘的区别，大乘各派的区别，禅宗一派的兴起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显宗和密宗的区别，密宗里面汉密宗与藏密宗的区别（大足石刻属于唐宋时汉密宗一派的造像）；再从另一方面了解印度佛教造像的变迁轨迹，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新疆、敦煌、天水、永靖、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各地石窟的发展变化及中国化进程，中国佛教石刻艺术在大足的地方化和世俗化等等，同时，他还从另一角度了解、探讨石窟开凿形式的变化，时代审美风尚对佛教造像的影响，中国汉文化的审美需要对佛教造像的渗透，中国艺术理论对佛教造像的制约以及强劲的汉文化风韵对佛教寺院、佛塔的渗透和改造……

在重庆干了几年后，在旅游界已声誉鹊起的陈蔚德，先后应邀去了海南、云南、河南，在几家旅行社和酒店任过总经理。很短时间里，他就从一个外行变成了中国旅游界的权威专家，担任过多次全国导游大赛的评委、总裁判长，担任过四川、河南、海南、安徽、陕西等省导游大赛裁判长，担任过国家旅游局导游考试教材的主要撰稿人，1998年被国家旅游局聘为全国特级导游评委会委员，还担任了多所高校旅游专业的聘任教授，门生满天下。现在网上都能看到他一些学生的文章，称他为“中国导游事业先驱”、“中国导游第一人”、“中国导游泰斗”……这当然与他丰厚的学养和精通多门外语，加上在外交部特别是在文革中的历练有关，也同他的勤奋、刻苦、学而不厌、永不自满有关。他可以根据游客的不同国籍用不同语种进行讲解导游，并在讲解中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引用（有时还翻译）从唐诗宋词到古文名句，从歌德的《浮士德》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从黑格尔的《美学》到郭小川或余光中的新诗……一般人要想达到他那样的水平是很难的。

有的人挣到钱后就尽情挥霍，沉迷于声色犬马，而陈蔚德老师则只是大量买书，埋头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最大的乐趣和享受。他后来给年轻的导游员传授经验时说：“学习知识不仅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学识，它还可以丰富我们的个性，陶冶我们的情操，健全我们的身心，使我们获得个人的独创性和自由的发展……”（《我的导游生涯》，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2 年版 64 页）有一年重庆市新华书店评选十大藏书家，他是入选者之一。当评选组人员去他家实地考察时，进

门后一看，不需要再细数藏书册数就已经一目了然。他的藏书不仅丰富，而且品位高，学术书、工具书、知识性的书占主要成份。他家自九十年代以后搬了两次，



书房不断扩大，最后是把客厅兼做了书房，但藏书仍然堆放不下，因为他总在不断地网购来一包包的书，因此总是书桌上、地板上到处都堆着。（左图：陈蔚德在他的书房留影。）

他每次搬家后都会及时告诉我，约我去聊，每次去他那里都是在“坐拥书城”的氛围里跟他聊文革往事，有时，他会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比如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给我读上一段他当年划上了记号的段落。有一次闲聊中他想起，当年谢富治写有一张字条，要求结束“揪刘火线”（还是“揪陈大军”？记不准也无法再向他核实了）的活动，在现场传达后，字条被他收起来，夹到了不知哪本书里……当然，我也总会劝他写下来、写下来……

二

陈蔚德老师本是被选拔出来的留苏预备生，因中苏关系恶化而被令改学东南亚语言，1964年从北大东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临时被国防部借调过去，为东南亚越老柬泰等国培训军事人员、“支援世界革命”作翻译。直到1966年才回到外交部。对那段经历，他曾简单地提及，还讲到老挝领导人曾许以优厚的待遇想把他长期留下来，被他婉拒了。2008年6月28日，他收到我转发给他的民间电子刊物《往事》第70期（2008年6月27日出刊）摘编的《我与中共和柬共》（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他马上读了，发来邮件说：

这一期的“往事”（第70期）是关于柬埔寨的，看来没有距离感，一些人是熟悉的，一些事情又和我在30多年前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岁月不居，时日如流，一眨眼30多年就过去了。我们那时候，一心以为是为“革命”，谁知竟是如此！荒唐之处，莫此为甚！！

这样被忽悠、蒙蔽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

回渝再面议吧。

《往事》的执行主编李宇锋听我说起后，给我发来了那个回忆录的全书电子

版，我马上转给陈蔚德老师，并告诉他，帮助撰写该回忆录的朱学渊，文革时是四川荣昌县中学教师，文革中参加造反派，来过重庆。和他姐姐朱学文（时为北大学生）一起支持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造反。陈蔚德老师于7月2日发来邮件：

那本书的全文已经收到，谢谢你！

顺告，我的父亲是重庆江北人（祖坟就在五里店附近），但母亲却是湖广填四川来的广东人，住在荣昌县。父亲在荣昌县做生意，在那里成家。我也是在荣昌县出生，从荣昌中学考上北京大学。真的没有想到，朱学渊居然也是荣昌中学教师，真是“天下真小”！

从1964—1966年，我在部队一直在培养东南亚的军事人才，为“世界革命”效力，至今老、柬、泰、越的军界，都还有一些我的学生。想来真的让人啼笑皆非！！

书籍还在仔细阅读中，这本书真的让我又回溯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回首往事，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三

陈蔚德老师曾跟我多次讲起他在北大东语系时最要好的同学赵国华，毕业后赵国华分配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文革中是有名的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副队长，曾受命参加彭真专案组和潘梓年、吴传启专案组（他还参与了配合公安部抓捕逃离京城的潘、吴的行动），后来又参加过王力、关锋专案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人民保卫组工作过，担任过《北京日报》社论组副组长、组长。后调《人民日报》社论组工作。1967年间曾多次参与“两报一刊”重要文章（如《中国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起草。后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但因是出身于三代工人之家、烈士后代而较早“解放”。据说毛泽东曾因赏识其一篇评《水浒》的文章而约他面谈过半天。

文革以后赵国华去了考古所，写了本《生殖崇拜史》，有不少新颖见解。陈蔚德老师讲到此书时，马上找出一本来转送给我（书出版后，他要了多本，随时准备送给有兴趣的朋友）。

2008年5月，我转发了一篇原学部文革亲历者孟祥才的回忆文章给陈蔚德老师，他于当月23日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转发的孟祥才的文章已经收到并看了，谢谢你！

同时感谢你最近不断地发来一些参考文章，使我对全局有更好的了解，虽然我也在网上订阅了《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和FT的有关版面，知道了除官方报纸以外的一些消息，不至于只能听一面之辞。

孟祥才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许多我都认识，赵国华也经常和我谈到。陈里宁是傅崇兰交给他主管的，由他安排陈去各处作报告。他除了参加抓吴传启之外，还参与了抓潘梓年，最后是由他陪同带回北京，交给中央文革的。毕竟，赵国华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成为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副队长”，傅崇兰的副手。（他是烈士子弟，铁路工人家庭，北京大学的优等生，季羨林最看重的学生，是季羨林亲自把他交给周扬，放在学部的。）赵国华参与了很多事情，也参与写作了不少文章……非常可惜，那时候时代气氛不对，他又去世得太早，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许多事情就湮没了，一叹！！

……如果能够和孟祥才他们接触，可能搞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傅崇兰、孟祥才他们对我应该不陌生，因为我经常去学部，在那儿吃饭，几乎多数晚上我都和赵国华在一起散步、聊天，不是他送我回外交部，就是我送他回学部。两地相距仅步行半小时。外交部的人也都知道他，我因此也受他影响，而被审查两年，直到他被毛泽东“解放”。我成家后，他第一次请我爱人把信件转给我，信件顶上附言说：“我敢说，我对陈蔚德的了解比你深刻得多！”

阅读孟祥才文，回首往事，真令人感慨万端！

在2010年3月17日的邮件中，他谈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赵国华预告了自己将在半年后离开人世：

大概是18年前，我和李玉民一起去他家，那是中国社科院的宿舍楼，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柳鸣九也住那里。赵对我说，半年后他要走了，凭着我们三十年的交情，希望我帮助他女儿找一个读书的地方。纵然结草衔环，也会“来世相报”！（我没在意，以为是笑谈。）当时，李玉民也在座。赵是懂得易经八卦的，1989年5月27日，在川外的餐厅里，大家要出去看学生游行（赵代表季羨林来川外讲学），赵大声说：“没戏了，还有一周就结束了。”果然，6月4号就完了。

这次也一样，刚刚半年，赵就无疾而终（社科院说是心脏病发了，在办公桌上去世的）。社科院的讣告曾经发给我，希望我去京参加追悼会。单位不准，我只能发了一份悼念的电文。后来，我通过朋友，让他的女儿进了北二外。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现在，北京的变化太大，即使去，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

他爱人只知道我们好。家中的东西，恐怕也没有什么了，有的只能是译稿。

电话也变了，奈何！（当然，如果我和李玉民同去，只要找到了柳鸣九，就能够找到赵的家。）

四

有一次，我看到旅美文革研究者华新民编发的1998年1月15日出刊的《华夏文摘增刊141·文革博物馆专集31》上有一篇署名“启麦”的回忆文章《告别少年时代》中，写到外交部五七干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好心的“五七战士”陈慰德，看着我们这群辍学少年，整日被人驱使着拉沙土、盖房子，学业全废，还自以为真的参与了什么伟大的事业，颇感惋惜。他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讲读书的乐趣，启发我们的求知欲。我和另外几个男生被他吸引，一有空就往他的宿舍跑，听他娓娓而谈。谁曾想，没过多久校方就正式通知我们几个，说陈慰德在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我们，因为他本人就有政治问题，“不许再同他来往！”

我读到以后，断定这里所写的“陈慰德”就是陈蔚德，我不记得是把内容转告给了陈老师还是把文章转发给了他（不记得他当时是否已经使用电脑和电子邮箱），他知道后，说那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而且他也大致猜到了当年还是少年的作者是外交部冉隆勃的孩子。因为文章里有这样一段回忆：

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一个叫刘佐业的人，顶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来。为了分散头上的压力，他竟说我的父母是经他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我父亲因无罪可认，自然态度强硬，专案人员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父亲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那里面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唐婉致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谁能料到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问题的铁证！”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会上，一个名叫王家骥的积极份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指鹿为马，郑重其事地对着几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讲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词：“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起首两句就是污蔑当前的大好形势；无法抒发内心的感受，所以叹息道“难、难、难”。词的下阕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叹在革命的风暴摧毁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然后，王家骥刻意把“角声寒、夜阑珊，”念成“脚步声

寒、夜阑珊”，说这是作者在隔离审查期间，听着巡逻者的脚步声，不能成眠；他不愿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装得若无其事、蒙混过关、所以要“瞒”、要“咽泪妆欢”。如此牵强附会，一定亘古未有。我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却无人容他申辩；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谁敢站出来指出这个天大的笑话？

这个笑话在外交部稍有文化知识的人当中尽人皆知，对陈蔚德这样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人来说，印象自然特别深刻。

陈蔚德老师多次跟我聊起外交部文革中的一些人和事。他讲到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工人家庭出身的王中琪，周恩来曾至少三次当众评价王中琪是“好人犯错误”。周恩来曾当面指责姚登山说：“当红卫兵把我搞得心脏病都快发了的时候，王中琪上来劝我：总理，你休息一下。你姚登山在一旁看着却一句话不说，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但王中琪还是在外交部较早被戴上了“五一六”的反革命帽子。

陈蔚德讲到另一个头头黄金祺，说他被认为是联络站“摇羽毛扇的”。他是50年代法文翻译的一流，长期为毛、周作翻译。文革后却在外交学院连讲师都评不上。只好提前退休，为妻（河北梆子名演员）作琴师，拉得一手好琴，并写剧评。后在剧团授予正高职称。

他还讲到夏义善，说他能力强，内部认为是联络站的二把手，为人稳重，一向不赞成过激行为。

陈蔚德讲得最多的是李玉民，在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头头中，李玉民和他关系最好，因为是贫农出身，“根红苗正”，李玉民在清查“五一六”时坚不认罪，曾被当作外交部的“一号五一六”，甚至要他交待“暗杀周恩来”的阴谋（因为当时北二外头头金文龙在逼供中乱说曾想暗杀周恩来）。专案人员还给李玉民读《列宁传》，以列宁从来就反对他哥哥暗杀沙皇来进行启发诱导。李玉民是1979年最后一个“落实政策”的，因为他不见到当面销毁整他的材料就拒绝在落实政策文件上签字。后来李玉民去了高校，从事教学与译著，到世纪之交已翻译出版法语文学名著40多部，获法国外国文学家金奖，被译界权威柳鸣九称为“译林高手”。陈老师还讲到，当年在干校后期，李玉民在另一处干校劳动，已经有了行动和通信自由，经常将译好的法国文学名著一段段地写信寄给他看，让他先睹为快。

他也讲到当时与外交部关系密切的外语学院造反派，讲到北外红旗造反团的头头宋远利、刘雨来，北外六一六兵团的刘令凯等等，他跟这些学生领袖都有交往。他说刘雨来从不在公开场合讲过激的话，每有重大行动都要写一式两份报告，一份给周恩来办公室，一份给中央文革。讲到学生们组成“揪陈大军”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要揪斗外交部长陈毅，北外造反团吴月辉写了批判陈毅广州会

议讲话的文章，当时据说毛泽东看了，称赞是批陈文章中写得较好的一篇。北外造反团在“揪陈大军”的广播站反复广播，因为播音员极像中央台方明的声音，不少路人误以为是中央台在广播，纷纷传说是“中央表态了”。

讲起那些当时被捧上了天，后来又被打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甚至被抓进监狱的学生，讲起那些学生执意要打倒的陈毅，陈蔚德都充满同情的理解。讲述中他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年遭到他们猛烈批判的一些陈毅“黑话”，其实那都是些立足于常识的大实话。

谈到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指责过的“外交部夺权”问题，陈蔚德说，其实只是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行使了业务监督权，这都是周恩来当时认可的，陈毅给他们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后还向他们表示了祝贺。联络站并未批发过外交文件，只批发过文革运动方面的文件。所谓姚登山当了四天半外交部长一事，外交部无人不知是联络站有一普通成员（“一般战士”）自行贴了一张大字报（只有一句话，实为大标语）：“强烈要求姚登山作外交部长！”一式两份，分别贴在外交部和天安门两地，但贴出当天就被撕了，并无影响。姚登山没有批发过一份外交文件。

关于那个著名的“火烧英代办处”事件，陈蔚德老师说，其实那是中央的决策引出来的。看一看当时的报纸就很清楚，群众的情绪是被一步步鼓动起来的。当时香港的骚乱不但受到内地文革的影响，而且直接有内地的有关部门插手。矛盾激化后，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英方发出的“最后通牒”，然后才有了群众的疯狂举动。“最后通牒”是由一个副外长和一个副总参谋长联署后报周恩来批准发出的（何注：我后来看到过有文章写到此事时为周恩来辩解，说是趁周十分疲乏的时候拿去找他签字批发的。这样的说法，既贬低了“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也伤害了向周报送文件的工作人员）。当时北京群众中传说：按国际惯例，如果“最后通牒”在48小时内得不到应有的答复，那么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断交，一是开战。所以北京的群众（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愤青”）就围着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等着英方答复。到最后有人数起了倒计时，数到48小时的最后一秒，英方仍然没有答复，愤怒的人群才开始骚动，冲击代办处，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在此之前中央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而且舆论上一直是在火上加油鼓动群众的反英情绪。但是后来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群众身上，推到造反派身上，甚至说成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

讲到外交部造反联络站这个曾经得到周恩来支持、肯定的群众组织，陈蔚德说，联络站也是周恩来一句话就搞垮了的。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经毛泽东审批并加写了点“五一六”（称之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那些文字后，1967年10月18日晚，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传达了周恩来接见时的一个讲

话，其中说：“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五一六、六一六的活动。”一夜之间，联络站垮完。“六一六”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组织，与外交部联络站当然有直接的联系。周恩来说得非常巧妙，把“五一六”和“六一六”连起来讲，而且用“直接或间接”这样的说法，就把什么都包括进去了，即使你跟“五一六”没有联系，但是跟“六一六”有联系，即使你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可以找到你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谁还能跑得掉？

讲到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陈蔚德说，这与周恩来的一个提法有极大关系。因为开始清“五一六”时，都在追组织，追是否填了什么表，谁介绍参加的等等。但后来追不下去了，因为追来追去没有查到一份登记参加“五一六”的表格。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抓罪行。还说，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这样一来，清查“五一六”就无限扩大化了，因为当时所谓“罪行”是个模糊概念，什么都可以无限上纲说成是罪行。外交部联络站不少头头或骨干被揪出来后，都不承认自己参加了“五一六”，但是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有罪”，那好，现在抓罪行，你就是“五一六”了。

陈蔚德老师特别提到一个被打成“五一六”的典型：朱根华，当时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国际问题漫画家。在朝鲜战场立过三等功，是二级残废军人。长期画漫画骂美帝国主义，却被自己人打成“反革命”，最早被戴上“五一六”帽子，又是第一个摘帽子的。朱根华被打成“五一六”，并不是因为有什么言行，而只是为他人打抱不平，认为外交部抓“五一六”扩大化搞得太不成话，揪人太多，他认为，外交部的人都是经过政治上严格审查才调进来的，如此多的人被打成“反革命”，把党中央置于何地？出于不平，朱根华反复向周恩来上书控告，被关押在小间隔隔离审查。他认为自己发出的控告信可能被扣下了，周恩来看不到，就冒险从窗口扑出去抱住一根电杆滑下，跑到中南海去再向周恩来送告状信。因而获罪。批判他时，说他“从小进出交易所”，意指他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蚀。其实那是他幼时家贫，7岁即进交易所跪着为地板打蜡以挣钱养家。当年朱根华还卷起裤腿让陈蔚德看过他两膝留下的老茧。

陈蔚德说，在专案组的逼供下，黄安国（8月14日外交部政治部夺权后的一把手）自供是外交部“五一六组织部长”，洪嘉自供是“副部长”。“交代”了不少人。最后被正式戴上“五一六”帽子的有二十人，被审查上千人，牵连更多。董越千，部长助理，延安时代给白求恩当翻译的，也受到审查。已打算审查徐以新（副部长，“二十八个半”中的那半个）了……最后无一人是“五一六”，无一人是真正的“反革命”。全部落实政策平反。

我问起陈家康——因为我曾在编辑党史期刊时重点了解过当年周恩来在重

庆领导南方局工作那一段历史，发现南方局时期跟随周恩来的潘梓年、孔原、荣高棠、陈家康等，在文革中都没有好下场，都是较早就被揪出打倒了，而且周恩来对这些他所熟知的老部下却并没有像“大树参天护英华”……陈蔚德说，在五七干校时，他是看着陈家康死的。那天他走在陈家康后面，去锅炉房打开水，看着这位老干部发病倒下去。他说，陈家康的问题是因为在1967年4月“亮相”批判陈毅，打破了部党委的“铁板一块”局面（揭发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就反对过毛主席，其实这是陈毅自己公开承认的，并非什么不得了的揭发）。周恩来在一次接见联络站头头们时批评：“陈家康只揭发别人，怎么不揭发他自己？”李玉民马上说：“陈家康是没有揭发自己，但是别的人（指姬鹏飞等）有的连刘、邓都不揭发，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几个月了，一个字的揭发都不写，这叫我们怎么结合他，怎么向群众交待？……”周恩来被这一插话弄得很恼怒、尴尬，当时起身拿起皮包要走，但又觉得不妥，重新坐了下来，说了一句：“李玉民，你很适合搞外交。”

陈蔚德老师还讲到一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场面：在湖南茶陵县虎踞山五七干校的一次批“五一六”大会上，一位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人，按专案组要求“现身说法”，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并且自供是由黄书海介绍参加的“五一六”。黄书海是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第二战斗队（第二亚洲司）队长，曾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作翻译，很受苏加诺的欣赏，据说苏加诺访华时，无黄书海在场便不讲话。黄书海结婚时，苏加诺用专机送来礼物。黄书海在被批斗中，从来都只说“我有罪”三个字，其他一概不承认。在那次大会上，他被揪上台要他交待，但他刚一说话就不断被口号声打断，便干脆闭嘴不说了。当大会主持者喝令他交代时，他就提出：要我说可以，但请不要打断我的话，等我说完了你们再怎么批判都行。于是，等全场静下来以后，他从容说道：“尽管刚才这位同志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但我还是认为他不是五一六，因为我也不是五一六，所以我不可能介绍他加入五一六。如果你们不信，就让时间来证明我们两人到底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好了，现在你们可以把我送上断头台了。”简短的几句话使全场震撼。

陈蔚德老师讲到这事时，我也深感震撼。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尽管他是以平静的口气徐徐道来的。

我一直希望他能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他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头头杨荣甲，是干部子弟，多年前找他详谈过几个小时，并录了音，准备要写外交部文革回忆。后来杨荣甲到非洲去了。

五

2005年10月初，湖南长沙的好友陈益南告诉我，他在香港买到了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外交部文革纪实》，并给我发来了他读此书时做的一些笔记（他有个好习惯，读书总要边读边做笔记）。我把陈益南的读书笔记转发给陈蔚德老师后，他马上于10月5日发来邮件说：

我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作者马继森倒是知道的，一位非常熟悉的朋友。她是冉隆勃的爱人，外交部联络站《革命造反报》的主要编辑之一。即是冉隆勃的儿子撰文说，有人批判他父亲时，居然把唐婉和陆游的《钗头凤》一词说成是他父亲写的。有人栽赃说，“病魂常似秋千索”，说明冉隆勃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待，所以才坐立不安……

文化革命中，我几乎每两三天去马继森那儿一次，通报外面的情况，彼此聊得十分投机。因此，她对外面的情况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她比我大十来岁，为人一向十分谨慎，谨言慎行。一般人见面，她都不说话。她告诉我，你还年轻，要注意，不要什么人都说。她又知道，我们这些人很仗义，受旧意识影响很深，不会乱咬乱供。很多心里话，她可以对我和李玉民说，甚至对她爱人都持保留态度。因此，当她爱人受到冲击的时候，被揪出来批斗的时候，她几乎无事，没有受到查抄。她爱人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供不出什么来。虽然如此，他爱人仍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鉴于上述情况，所以她手边保留的原始材料应该比较多，包括全部的《革命造反报》。她也参加了一些接见记录的整理，对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十分熟悉。在我负责安排姚登山的对外活动和报告时，因为她是外交部小报的主要编辑，因此我都随时向她通报情况。由她来撰写这本书，不会出现想当然和人云亦云等等情况，她自己和家庭都是受害者，我相信，这本书应该有很大的客观性和可读性。

她现在应该有七十多岁了，由于年纪的原因，也许会出现个别失误，我想，在她这本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对外交部当时的运动情况回忆得更为准确。

如果能够找到这本书，希望能有机会一读。

冉隆勃、马继森和李玉民都是十分熟悉的，和王中琪也很熟，因为王中琪也是新闻司的干部，他们在一个司共事（何注：后来陈蔚德作了更正，说马继森是西欧司的）。

何方的笔记（何注：指我发给他的何方《党史笔记》的电子版）还在细细地阅读中，越读越觉得，何方十分厉害，文笔老辣、朴实、扎实，几乎颠覆了整个共产党的历史。他这一本书，可以顶别人的几十本党史。这再次证明，姜还是老的辣！！我敬佩老一代的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决心。

当晚他又发来邮件：

刚才和李玉民通了电话，他说，他那儿就有一本马继森写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每年他们都要聚会几次，为了写那本书，王中琪、李玉民、张殿清等人都提供了不少材料，有些问题还是大家共同回忆、研究、讨论，把事实搞清楚了以后，才下笔成文的。他说，最近他比较忙，大概不容易见到马继森，如果见到了，他给我向她要一本。

由此看来，这本书的分量就不轻了。虽然这本书出自马继森之手，但实际上是外交部文革中的一些当事人的“集体之作”。

李玉民说，他最近去北戴河，还见到宋远利（北外红旗造反团的二把手、三司的副司令）和唐明全（负责揪陈大军的主要骨干），同时他还把王中琪、张殿清都拉去北戴河了，大家一起谈了不少文革中的事情。

2005年10月11日，我在给他的邮件里说：“我虽没读到此书，但从湖南朋友的笔记看，感到似乎在对造反联络站的记载上仍不够全面。当然也不可苛求。目前形势下能出这样一本已经算不错了。听北京王年一先生（原国防大学教授，文革史专家）说，马继森送了一本给他。他认为很好。看来此书在北京可能好找。”

陈蔚德老师当天回复我的邮件说：

你的看法是对的。由于许多当事人不说，文革的问题被搞得面目全非。马继森的条件较好，可以找到许多人核实，我一个人远离北京，无法和朋友们交流，因此迟迟未能动笔写东西。去年国庆李玉民曾经约我去北京，但是因为工作走不开而未能赴约，遗憾！

当晚他把陈益南读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的笔记读完了，发来邮件说：

笔记已经读完，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分量有多大，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意犹未尽。……感到很不解渴。自然，马继森会受到她本人没有亲历，也受到环境和当前情势的影响。我想，如果能够有人提头，让每个亲历的人写一段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许不够全面，但是对搞清当年那些史实，会有帮助得多。人都天各一方，要想集中起来，又谈何容易！

我记错了，马继森是西欧司的。自然，她对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她了解的是决策过程），但是，在现场又是如何发生的，那就最好由金文龙、凌国建这些当事人来写更为恰当。

不过，她的这本书一出来，国内外对于外交部文革中情况的误读和误写（想当然的写），就会重新审视，这对于正视听是有好处的。这应该是这本书的最大功绩。

文革过去还不到三十年，一些人就把那段历史搞得面目全非，而许许多多的当事人还活着，令人一叹，更遑论那些已经过去许多年的历史。

匆匆想到，就写这些，也许我会为我的想法作一些事情。

接着他在又一封邮件里说：

来信收到，该书资料似乎还不够全面，所列十七位“五一六”分子中，李玉民、王中琪、张北、段纪霄、王荣久、朱根华、金君晖，都是我的至交，文革后期，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还很好，只是后来我回渝了，才和他们逐渐疏离了，仅仅和李玉民维持着老朋友的旧情，头几年还去看过张北、金君晖、朱根华，可能另三位应该有黄安国、洪嘉，因为他们两位交待说是“五一六”在外交部的组织部长和副部长。……纪焕章差不多成为精神病人，和我在一个班劳动，还有倪立羽（倪是日内瓦会议为周恩来起草讲话的人）。金君晖是研究美国战略情报的专家，英文、法文、捷克文都熟，给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都作过翻译，他们都为他题写过条幅，但是都被收走了，不知道后来发还他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些冤屈，一言难尽！所以，我在八十年代填的词中才有：“超影绝尘今已矣，到穷途，刍豢无凭准，长太息，有余恨！”

六

可惜陈蔚德老师一直忙于导游和旅游文化方面的著述与教学，始终没有能把写作外交部文革的回忆提上日程。他先后任过十余所高校旅游专业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导游和旅游文化研究人才。他没有时间静下来“为我的想法作一些事情”。2002年，他又应河南大学邀请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旅游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在2008年6月28日邮件中说：

由于全河南省的旅游大专老师的三周培训，安排在8号开始，因此，我要在讲一天半课之后，才能够飞渝。回到重庆大概是11号、12号的时间了。

7月2日的邮件中说：

全省的旅游学校的老师培训从8号开始，第一天当然是领导讲，我在第二三天（9、10号）讲，我将在12号周六乘机返回重庆。五年要把全部老师轮训一遍，09、10、11年，我都会参加这样的培训。好在有点事情干着，倒也比在家无事要好些。平时就是读书消遣。回渝后，找机会一晤叙怀，心中堵得慌。

我当时完全没想到他的“心中堵得慌”不仅是思想上的。暑假之后，他回到河南大学不久，就突发心脏病，先在郑州、后到北京做了手术。10月12日，他收到我发去的杨继绳《墓碑》电子版后发来邮件：

我已经于昨日回到重庆养病，这学期不会再去郑州了。春节以后看身体情况而定。

我早已经从英国“金融时报”上知道了《墓碑》的消息，丁学良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我正不知道从何处能够找到这本书来读，谁知道你竟然在我离开郑州的前夕发来了，心中喜悦之情真的难以言表。谢谢！！

有机会希望见面叙怀。这次在北京做手术，见到了李玉民和杨荣甲——就是我和他谈了六小时，并录音的那个人，他不仅是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还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他说，很多人都是根据官方的说法来写历史，错的太多了。他很快也有一本书问世（关于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大概20余万字。

陈蔚德老师说是回家养病，其实只休息了很短时间，感觉一好，就又回河南去上课了。2009年3月27日，他从河南发来邮件说：

我康复很好，已经回校上课一个多月了。

谢谢你最近不断发来的一些材料，《记忆》编的既快又好，大大开阔了视野。中国的事情终究要起变化的，虽然还要经历一些曲折。

4月13日下午，他读到我谈在都江堰旅游景点发现有出售的文革文物造假的邮件后，回复邮件中说：

我一向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败招”就是教人说假话，以至现在全国说假话、造假成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同时，又在知识分子中制造了许多“叛逆者”！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都是没有的。世风日下，要改变这种状况，恐怕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了。一叹！

最近你寄来的材料，包括聂绀弩和关于大跃进的，都使人获得许多启示。关

于“大跃进”，现在总算有人开始说真话了。

我身体很好，随着天气转暖，身体会越来越好，可释远念！

几小时后他又发来邮件：

下午打开电脑，又收到了立凡近作。读了关于冼冠生的一篇，感触良多。你大概还不知道，我的爱人就是冼冠生妹妹的孙女。她奶奶从小和冼冠生一起，从提篮小卖开始，创业“冠生园”。在三年“人祸”中饿死，死后还给孩子们留下了30斤粮票，压在老太太的席子下！老太太一周的菜肴就是两块豆腐乳。我爱人每提起来，都眼泪汪汪……我的老丈人（她的父亲）从解放前到他去世，一直是冠生园的总会计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医疗事故去世（那时我已经调回重庆），我的老丈妈今年已经90岁了。这个月17号将举行90大寿的庆典。老人家会讲许多冼冠生的故事和冼冠生及其妹妹的事情，这些事情和以前《重庆日报》发表的“天下一冠”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在三反五反中的情况和冼冠生之死的真实情况。

也许，我的动笔就从写老人家讲的冼冠生开始。

许多历史事实都遮上了许多迷雾，总需要人们一点点地给予澄清。

好在那些知道历史真相的人还有的活着！！

在2009年7月15日，他发来邮件告知：

一周前，我已经回到重庆休假，大概要在八月底返回郑州。一般我都在家看书，方便时可以电话联系。

8月8日的邮件中他写道：

我将在八月底返回郑州，8月25号应桂林旅游局邀请，去给他们的导游员讲课一天，然后回渝。之后大概在8月30号回郑……九月份学生要军训，我不上课，但是，我可能去河南大学给研究生上课一周……

今年这个假期还算好过，不太热。这个假期给导游员写了两篇关于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文章，河南没有人写，我勉力为之，花了一周，写了大约一万字。为人作嫁衣裳吧。

2010年3月17日邮件中说：

我已于上月 24 号回到郑州，上课已经半月了。非常感谢发来的《冀朝铸回忆录》，我们在一栋楼里待了八年，他们在二楼，我们在四楼，彼此也有过一些交道。老冀是一个老实人，从来没有整人的举动，他居然去美国定居了，这是我今天才知道的。他的回忆录里面，还是有一些真话：起码他对这个政权不大满意。对“六四”，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估计，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难哪！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自然，记录不会完全一样。只有大家都如实地写出来，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我曾经希望了解冠生园的内幕，老太太说，干嘛呀，不要无风起浪！这是谁的天下？她不愿意告诉我。奈何！根据平时的一鳞半爪，写出来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一叹！

……

我的态度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希望中国动荡，一动荡，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希望能够和平的走下去，这和傅国涌的态度相近。

2011 年 2 月 13 日邮件：

鉴于学校即将开学，我于昨天乘机回到学校。

……

今天六九已经结束，七九即将开始，这个寒冷的冬天终于行将结束。我的身体很好，经过调理，已经与 08 年相似，我或者再干两年，等到新校舍建成，我就将结束教学，返回重庆，安度晚年。毕竟，明年我就是“古稀之年”了。

2011 年 6 月 25 日邮件中说：

钱理群先生的文章读完了，真的很精彩，把许多问题都阐述清楚了，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令人深思。

我的课已经上完，只等着复习考试以后就结束学期了。

不知道是否还要培训旅游学校的老师，如果要，我就多呆一两天，七月十号以前肯定回渝。明年的全国旅院、旅校学生导游大赛于明年 5 月 20 日在我院举行，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在这里，无论如何我要待到明年。

下半年把我关于旅游的几本书，包括还没有出过的书，修订、补充、整理一下，重新一齐印刷出版，这样也就算划一个句号了。

6月29日邮件：

因为要举办河南省旅校老师培训班，培训班10号开学，我要讲课后才能回渝，回渝时间大概在12、13号。

看见五大宗教合唱团（何注：指当时网上传的五大宗教界人士“唱红歌”的镜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没有人唱了，居然拉来宗教界人士，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被外交部“淘汰出局”后，在旅游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他找到了人生的新位置，而且使他人生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他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全部精力，即使在心脏手术之后，也仍在马不停蹄地工作。在他去世后，师母告诉我，他曾多次表示，他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只注重生命的长度，要活到多少多少岁，他更重视的是生命的厚度——要在同样的生命长度中，做更多有益于社会的事。

（上图：陈蔚德在讲课。）

但是，他很快又得到了身体发出的警告。这是他“彻底退休”后给我的两封邮件——

何蜀兄：你好！

这次暑假回来，生了一次大病，决定回校辞职不干了，我已经回到郑州，十月中就回到重庆了，以后就再也不来这里了。

我7月脑梗，康复尚好，行动无碍，可以随意来去，但是我已经69过了。明年就是70，够本了，我比别人差不多多干了十年，够了！

最近我在整理我的著作，年内出四本书，都是关于旅游的。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时日不居，来河南已经 12 年了！
回渝后再抽时间畅叙衷情！

蔚德 2011.9.30.

他在 10 月 8 日发来邮件说：

我已经购 11 号上午的机票。中午 12 点，即到达江北机场，此后，我就在重庆长住了。

东西经女儿国庆节来收拾，已经托运到达重庆，只剩下我自己了，随身一个挎包和一个箱子。

以后有机会可以随时聊天、交谈了。

不过，陈蔚德老师回到重庆后并没真正“彻底退休”，他还一直在赶写他有关旅游的书。2011 年 11 月 16 日发来邮件说：

近日，因为有了教学压力，我的身体在慢慢康复，期望经过半年的调养，能够基本适应文字工作。那就可以修改我的书稿了。

计划在明年，加上今年底的一本，能够修改和写出四本书来（这几本书都是关于导游的），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七

2011 年底，我得知杨荣甲所著外交部文革回忆录已在香港出版的消息，问陈蔚德老师看到没有，他于 11 月 17 日发来邮件说：

这本书的作者是杨荣甲，他是李玉民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核心组成员……他是了解外交部情况的。他只说，在香港出版了，他手边没有电子版。只有等着了。

他现在也用电脑，随时给我发来一些东西（北京毕竟消息灵通）。可惜，李玉民至今还是用笔翻译，效率就差多了。（他们都不熟悉汉语拼音）只发东西，不写信。

他曾经想去非洲写书，但是，很多材料还是在国内。因此，出去三年，又打道回国。临行前，曾经和我交谈几个小时，录了几盘磁带。看来是想把时间搞准确。应该说，他的书会有相当的分量和可靠性。

.....

他的年纪比我大两岁，大约是 71、72 岁，思维敏捷。他父亲是解放初期鞍山市的市长，大概是一个将军。他们家住在文革中于会泳住的地方。

2012 年 1 月 9 日，我给陈老师发去邮件，附上了由丁东兄推荐来，准备在《记忆》上发表的外交部老干部宋以敏为杨荣甲书所写的序《写在前面的话——〈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序》，我告诉他：“我们月底这期要发。现先发上让你先睹为快。有空时不妨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在 2008 年退休后与北京朋友吴迪（启之）一起办了电子刊物《记忆》，2011 年底我退出《记忆》，另办了《昨天》。退出之前我已编好准备在 2012 年 1 月发的一期《记忆》中包括宋以敏文章在内的几篇稿件（后因《记忆》相继推出了北师大女附中专辑和邱会作著述研究专辑，这篇文章所在的那期《记忆》推迟到 3 月底的第 82 期才发出）。

次日（1 月 10 日），陈蔚德老师就回复了邮件——

来信收到了，读后真的让人感到痛快淋漓！这是有人第一次提到，外交部抓“5·16”分子，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和组织的。在湖南干校、江西干校，我都曾经和宋以敏接触过，因为我被分配在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人一起劳动。所谓“把‘5·16’分子分而治之”。宋对我们是比较好的，没有“义正词严”，也没有“青面獠牙”，在没有人时，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心里是感到温暖的。

杨荣甲在上面，我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下面。当时（何注：指文革结束多年后杨准备写作有关外交部文革回忆录时），杨约我谈了一天，还录了几盘磁带。我只告诉他，不要出现我的名字。我要读过了杨荣甲的书之后，才能够写补充材料，以便使他的书变得更为充实。

外交部抓“5·16”分子，多达 1000 以上……至于全国，那就是数以千万计。所谓的“清查 5·16 运动”，是比“反右派斗争”更为残酷的一场运动！至今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因为，这个事情一揭开，会把毛、周、林以及所有的当权派都牵扯进去。所以，当事人宁可“一风吹”，什么也不提了。一揭出来，就没有脸了！（视人民为寇仇！）

.....

在运动中，秦基伟的小舅子，和我在江西干校一个班劳动（养猪班），被整死（上吊死亡）。所以，秦基伟对外交部的“清查 5·16 分子”非常反感，就来源于此！

要说起外交部的“清查 5·16 分子”的运动，我真的是百感交集。如果我现

在读了杨荣甲的书，我会写很多补充材料，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宋以敏的序言，实在是揭开了千古秘辛！有了她这篇序言，外交部的“文革”，就可以完整地写了！

可惜因为身体等原因，陈老师一直没有能把他的外交部文革回忆写下来。

2012年7、8月，陈老师应友人邀请与妻子一起去广西巴马休养了两个月。回来后曾写了一篇小文《印象巴马》，对那个既是国家级贫困小县，又是由国际自然医学会按百岁老人所占人口比例命名的“世界长寿之乡”的瑶族自治县，作了通俗的介绍，从自然地理、生活习惯等方面分析了当地百岁老人那么多的原因，又对正在开发和变化（下地劳动者减少和两极分化加剧）的现状表示了担忧，他认为：“如果政府也只着重于金钱，着重于开发，不看长远的话，这个‘世界长寿之乡’将在几年内不复存在！”他在2012年9月25日的邮件里说：

《印象巴马》一文，乃是有感而发。环境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全国各地兴起的反日浪潮，值得关注。北大用文革语言给日本写了一封信，各地游行时，还举着文革的画像。就像温总理所说，要警惕文革重来的危险！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想到，几十年了，还停留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水平。香港报刊评论，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可能在100年以上！

那些反日的人，甚至打伤我们自己的同胞。个人的财产丝毫得不到保护，成何体统？

当然，除了个人冲动之外，还有人想利用民气，推波助澜，才变得无法控制！可叹！

我在巴马，明显看到了两极分化，当官的，有钱有地的，越来越富；而普通农民，因外地人大量涌入，物价飞涨，那些9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地里劳动，甚至104岁，110岁，还在挣钱，也是迫于无奈。只有到基层，你才真正了解老百姓的甘苦！

巴马的感受，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的。两个月没有白住！

那里有一栋楼，叫做“深圳人家”，设施豪华，一间房一晚上要3000块，这哪里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住的？

2013年3月19日，他在邮件中说到，回家后，因94岁的岳母（他称“老外婆”）需要他们夫妇照料，所以生活很受影响，许多事都做不了。因老外婆已患老年痴呆，病得不轻，每天不能离人，否则就不知会出什么事。他感叹说：“我

们是受旧教育长大的，不能眼看着不管，硬撑着吧！”

转眼一年年过去了，我因忙于编《昨天》和整理录入一些文革资料，加上从2011到2013年间协助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重庆市图书馆录制了147位文革亲历者口述（从事前的寻找物色、说服动员，到录制时帮忙提供资料、现场提示，录制后整理文字，校阅记录……），同时帮助整理出版了几位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与陈蔚德老师的交流就少了，虽然同住一城（他在城北，我在城西），也难得见面。只是经常通一下邮件或电话，从电话里能听出他精神不再像过去那样健旺。去年有朋友告诉我，在一次友人后代婚庆宴席上见到陈蔚德，差点没认出他来，而且觉得他再不像过去那样健谈了。我想，可能是话说多了对他心脏不利吧？不过我又想，既然他们夫妻俩能够出来赴宴，可能是老外婆已经走了。这样他应该有更平静的时间做自己的事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年（2016年）5月底，突然得到有朋友辗转听说的消息：陈蔚德老师已经病逝了！我不敢也不愿相信，打电话到他家里，始终无人接听。好不容易打听到师母的手机，才得知他是因脑梗加心梗，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一段时间，于5月29日去世的，还差四个月满74岁。

他曾在2008年6月15日的邮件中说：“学校已经停课，我将在考试阅卷以后，大概在21号左右返回重庆，至时可谋一晤。……半年来，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够找到人倾诉衷肠。自然你是最合适的人了。”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是在家乡重庆这个小范围内，就文革话题作畅谈，我是他认为最合适的谈话对象。

可是，我们再无这样“一晤”、“倾诉”的机会了！他所亲历的那些文革往事，特别是那些只有他知道、他记得的往事，以及他有关的感想与反思，全都被他带走了……

我只能尽量把还记得的他讲过的那些文革往事，把他给我的邮件里记录的那些零星回忆，汇集起来，留给对那些历史有兴趣的人们，以“求友声”，并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16年7月26日于重庆风江阁

【编读往来】

编辑部更正与说明

本刊73期第20页中“已故清华红教工托德坚老师”，49页中“清华托德坚”，其中“托德坚”均应为“陶德坚”。原稿并未写错，经检查，问题出在最后校对时，因发现最后一篇历史资料《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

大事记》中还有些散见的繁体字未改成简体字，就使用了 word 文档的繁简转换功能直接将其统一转换，没想到此功能竟会将“陶德坚”转换成为“托德坚”，造成这个不应有的错误（是否还有类似错误目前尚未发现）。但在试验中又发现：输入带“陶”字的陶铸、陶冶、陶瓷、陶然亭、陶德坚、陶世龙、陶成章、陶希圣、陶里亚蒂、立陶宛等词汇，一点击繁简转换功能中的“转换成简体”，只有“陶德坚”要被转换成“托德坚”，其他的“陶”字都没有变。不知是怎么回事。以前只知道简体字转换成繁体字会出现许多错误，没想到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也会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为此，提请各位作者今后在使用文档的简繁/繁简转换功能时定要慎重。当然更希望设计此功能的专家能设法改进。

可父谈 73 期

读此类回忆，以及接触这一类人，我的感觉是人生苦短，命运多舛。应该说，这些大哥大姐们（我是老三届初中生）经历的事情的确值得记录下来，我也相信他们的回忆是真诚的和负责的。最近又看了看王大宾的回忆录，这期《昨天》也是有关文革中北京地院的，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读来让人感到新鲜、真实，但总觉得不够。尽管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作为亲历者也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几十年的新的经历。因此，不能还是没有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换一个角度的反思，哪怕是有“哦，原来是这样……”或“如果……恐怕……”之类的感悟、感叹，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以为，反思是比回忆更深刻的回忆！

小培谈 74 期

74 期文革日记专辑，看了 3 小时都还没看完，只好暂停下来，第二天接着看。太真实了，太沉重了！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知青生活和思想。这些日记内容很丰富，是个人史，是知青史，也是一段农村社会史。总之是大社会的小缩影。